

## 第二章 調查課的組織與人事

### 第一節 設立之經緯

#### 一、 設立之背景

官房調查課的前身為統計課，該課的成立經過數年的時間。1900年4月，署名櫻嶼學人撰寫〈臺灣的財政與臺灣的統計〉一文，強調統計業務的重要，並建議總督府能在制度上有所變革，略謂：臺灣財政的獨立自1900以迄1909年度，總計約需1580萬圓的補助，惟本國處於所謂戰後經營尚未完成的狀態，國家歲出年年向上增加，財源匱乏的聲音四處可聞，萬一統計稍有不精確，難保不會發生要求更多數額補助的情況；統計本身因索然無味，不太能引人產生興趣，加以國人欠缺統計思想，往往置之度外，但將錯誤的統計散佈到社會的危害，實遠大於刑法上的犯罪；現今臺灣統計事業的不完備自不待言，其中，作為財政基礎的土地、戶口等經濟統計最感必要，然而可信的調查卻鮮少，因此吾人以爲有三種作法可供採行：第一是統整總督府各單位的統計事務，另外新設統計課；第二是嚴格挑選適當的人，有效從事統計業務；第三則是改善蒐集統計相關資料的方法，並謀求製作的迅速。<sup>1</sup>

總督府在臨時台灣戶口調查部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後，才著手統計課的新設；因為該部所處理的人口動態統計，在性質上屬於永久都要進行的事務，總督府乃於1907年考慮新設一課，而且屆時也將民政部各單位的統計事務移轉給該課。<sup>2</sup>到了1908年7月，總督府公佈訓令第106號，修正1901年的訓令第354號，據之規定統計課執掌關於（一）統計的製作與報告與（二）統計的監督；同時，任命水科七三郎技師

---

<sup>1</sup> 櫻嶼學人，〈臺灣の財政と臺灣の統計〉，《臺灣經濟雜誌》第17號（台北：臺灣經濟雜誌社，1900.4），頁7～8。1900年度在原文寫作明治43年度即1910年度，應為誤植所致。

<sup>2</sup> 《臺灣日日新報》，1907.9.20，〈統計課新設〉。

爲首任課長。<sup>3</sup>

水科七三郎原來的身份是海軍屬，1903年8月被任命爲專賣局技師兼總督府技師，不久服務於官房文書課。<sup>4</sup>他在總督府連續工作13年又7個月，直到1917年3月底以腳氣病爲由卸下統計課長職位，並得到1000圓的獎賞。<sup>5</sup>其後，他仍以囑託的身份繼續協助臨時國勢調查部和統計課<sup>6</sup>；囑託一職於1918年3月底解除，同時獲得300圓的獎賞。<sup>7</sup>因此，水科並沒有進入即將成立的調查課。

調查課的設立，不僅僅是總督府內部的作業而已，時論的鼓吹也發揮一定的作用。1914年底，東鄉實即撰文論述南方經營的基本措施，其主張當局如欲達成熱帶統治的理想，必須展開以下的工作：派員短期考察南方；派員長期調查南方；派遣學術探險隊；設置南方調查局；創立關於熱帶殖民的高等教育機關。此外，東鄉建議總督府改造舊慣調查會，使其不僅從事民族心理之研究，也能成爲南方研究的一大機關。<sup>8</sup>

當時，在主要報上不時可見要求進行產業調查，進而設立專責機關的相關論調，茲舉數例說明如下。

(1) 1917年5月，《臺灣日日新報》表示，爲期待產業的真正進步和發展，首先有必要進行各方面的基本調查，方得據以確立產業政策的根本方針，然而，本島的現狀是欠缺此種機關，因此其作爲不免含糊，故若欲規劃將來本島產業的振興，設立調查機關爲當務之急。<sup>9</sup>

(2) 1917年7月，《臺灣日日新報》建議，如何處理戰時及戰後

---

<sup>3</sup> 雜報，〈統計課ノ新設〉、〈統計課長〉，《臺灣統計協會雜誌》第31號(1908.7)，頁87。

<sup>4</sup> 第917冊《》，第11號〈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技師兼總督府技師：水科七三郎〉、第919冊《》，第1號〈官房文書課勤務ヲ命ス：水科七三郎〉。

<sup>5</sup> 第2744冊《大正六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二卷》，第23號〈免官；賞與：水科七三郎〉。

<sup>6</sup> 其職缺由民政部地方部長兼官房文書課長暨參事官的楠正秋兼任。雜報，〈水科技師退官〉，《臺灣統計協會雜誌》第135號(1917.4)，頁63。

<sup>7</sup> 第2884冊《大正七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3卷2》，第73號〈退賞、退職：水科七三郎〉。

<sup>8</sup> 東鄉實，〈南方經營の根本的施設〉，《台灣農事報》第98號(台北：台灣農友會，1915.1)，頁1~6。

<sup>9</sup> 《臺灣日日新報》，1917.5.31，〈產業調査の急務〉。

的經濟問題，今日若不預先充分講究策略，到時將狼狽不堪；因而希望臺灣當局依緩急程度，迅速進行產業方面的調查。<sup>10</sup>

(3) 1917年8月，《臺灣日日新報》再建議，很久以前即認為有必要在總督官房之內新設一課，以總括和統整各種統治所需的調查，隨著各單位事務的逐漸加重，各自孤立的調查也難免多有所不便和不定，加以中央政府亦新設拓殖局以銳意於殖民統治，故目前實是在官房之內設立一新的調查課以相應之的最佳時機。<sup>11</sup>

除了《臺灣日日新報》刊載上述的相關言論之外，不少活躍的記者也都針對此一問題，紛紛撰寫文章加以鼓吹。1917年10月，著名的報社主筆橋本白水撰文催促總督府設置調查課，以便派遣人員調查華南和東南亞；他認為雖然有人主張使臺灣銀行照會其在華南和東南亞的支店，或是三井物產照會其支店，乃至照會領事即可，但臺銀支店無暇一一調查回覆，縱然有之，難免隔靴搔癢，更遑論其它，尤其三井以利益為本位，不欲他人插手；此外，認為調查課也應調查臺灣的產業等，總督府宜使社會瞭解，以收宏效。<sup>12</sup>

又如，原為台南新報、後為大阪經濟新聞社記者的古川浩，曾經住在台灣5年，其撰寫〈南支那研究會設立之必要〉一文，謂安東貞美總督和下村宏長官上任之後，首先推進南支南洋的政策，如今正就緒，臺灣總督府的事業今後將不限於島內，而朝向大規模的積極方針乃是無庸置疑，尤其對岸的經營是延遲一天則損失一天；日本若以臺灣作為根據地，以廈門和汕頭為玄關，而樹立深入華南活動之計，不數年要在華南培植穩固的勢力絕非難事；吾人以為住在台灣者為對岸政策的先鋒，殷切希望趁此機會設立各種華南的調查研究機關。<sup>13</sup>

1917年10月，《臺灣日日新報》連載五篇〈南洋發展的運動〉，此一系列文章總結10年以來的南洋熱潮，並有系統論述南洋發展的經

---

<sup>10</sup> 《臺灣日日新報》，1917.7.27，〈產業調查〉。

<sup>11</sup> 《臺灣日日新報》，1917.8.12，〈官房に調査課〉。

<sup>12</sup> 橋本白水，〈台灣總督府に調査課を設置せよ〉，《筆戰十五年》（台北：南國圖書刊行會，1928.5），頁155~157。

<sup>13</sup> 古川浩，〈南支研究會設立の必要〉，《南支那研究誌》（大阪：大阪經濟新聞社，1920.8），頁351。

過，以及強調調查為南進之母。第一篇認為竹越與三郎所寫的《南國記》，對於醞釀南洋熱潮實有推波助瀾之效。<sup>14</sup>第二篇推崇民間與官方的二位人士，分別是台灣銀行的柳生一義與前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前者致力於派遣行員進行南洋的調查，後者對於海運有相當大的作為，也曾派出幾位技術專家前往南洋考察，包括東鄉實到菲律賓在內。<sup>15</sup>

第三篇具體描寫重要人士的活動，略謂：(1) 在內田嘉吉的官邸裡，設有小型的南洋圖書館，其後成立的南洋協會台北支部也以他為中心而運作著；(2) 以南支南洋的調查研究為主旨的雜誌《南方》誕生了，但僅維持 7 期即告停刊；(3) 台中的松岡富雄著眼於菲律賓，並推展各種的計畫；(4) 台灣新聞的主筆梶原保人發表《圖南遊記》，大野恭平與佐藤四郎出版《南國》，東鄉實、松岡正男、金平亮三等人則報告其調查的結果；(5) 1916 年召開了共進會，另有以高木友枝為團長的南洋觀光團；(6) 高雄方面也有人呼籲以該地為南洋發展的基地。<sup>16</sup>

第四篇指出實業界的動向，包括(1) 下村宏繼內田之後接任民政長官，台銀的董事長則換成櫻井鐵太郎，二人在既有的基礎之上再加以擴充，並且都使屬下有較多出外考察的機會；(2) 台銀副董中川小十郎等人提倡台灣糖業南進的論調，而殖產局單位也認識到機會正在成熟，「南支南洋施設費」乃逐年增加起來；(3) 林謙吉郎等人以久原商社的資本向北婆羅州的斗湖去開發土地，堀內次雄也調查了當地的衛生狀態，此外，尚有南洋製糖的平岡定太郎及新加坡的後藤隆夫等

---

<sup>14</sup> 《臺灣日日新報》，1917.10.18，〈南洋發展の運動が（一）〉。目前可知歷史學家田中萃一郎曾在《三田史學會》撰寫書評《竹越與三郎著「南國記」》，惜未能得見。參閱：氏著，《田中萃一郎史學論文集》（東京：三田史學會，1932.8），頁 4。

<sup>15</sup> 《臺灣日日新報》，1917.10.19，〈南洋發展の運動が（二）〉。柳生一義於 1916 年離開台銀，當時三好德三郎等人商討的結果，決定為其建造銅像以茲紀念，三好並向官方取得同意，於是地點選在台北公園，1918 年 9 月舉行揭幕儀式。參閱：波形昭一，《民間總督 三好德三郎と□利茶舗》（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2002.8），頁 162~163。柳生後來任職日本郵船公司，1920 年 1 月去世。參見：佐藤佐，〈明石、柳生時代の南方經綸〉，《大亞細亞主義》（東京：大亞細亞協會，1934.5），頁 30。

<sup>16</sup> 《臺灣日日新報》，1917.10.20，〈南洋發展の運動が（三）〉。

經營者。<sup>17</sup>第五篇繼續上一篇提到總督府最近大舉派遣加福豐次、阿部滂、片山秀太郎、梅谷光貞、鎌田正威、伊藤兼吉一共 6 人前往南洋考察，台銀方面同樣也有相應的舉措；尤有甚者，上述 6 人為事務官，而非以從前的技術人員為對象，顯示總督府的方針有所改變。<sup>18</sup>《臺灣日日新報》被視為常能反映總督府的意向，正如其副標題強調坐而言的時代已過，眼前已是起而行的時代。在此種時代背景之下，調查課的設立毋寧是相當順理成章的事。

1918 年 6 月，片山秀太郎被任命為調查課長，其身分是法務部民刑課兼監獄課勤務暨參事官，同時，總督府尚發布殖產局商工課長田阪千助兼任該局的水產課長，以及翻譯官丸井圭治郎擔任地方部社寺課長。<sup>19</sup>因此，總督府並非單獨設立該課，而是有整體的考量。茲以社寺課為例略作說明。1915 年發生西來庵事件後，新上任的民政長官下村宏向總督安東貞美提出的意見書中，主張對本土宗教應利用善導，總督府不久即展開宗教調查，以便著手宗教制度的整理；1918 年 3 月，迨各地方廳的調查告一段落，宗教台帳與調查書等被提交社寺課，在首任課長丸井的主持下，1919 年 3 月出版了《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sup>20</sup>可以說調查課與社寺課同樣擁有 3 年的準備期，二者也都是以調查和出版為業務，藉此提供總督府擬定相關政策時作為參考之用。

調查課設立不久，署名黃楊生的投稿者在報上發表看法，認為調查課的新設實係合乎時宜的舉措，惟眼前不過才數十位的兼務人員，

---

<sup>17</sup> 《臺灣日日新報》，1917.10.21，〈南洋發展の運動が（四）〉。

台灣資本家往南洋投資的先驅為三五公司及渡邊國重等人在馬來半島進行橡膠栽培。1913 年荒井泰治、楨哲等屬於鹽水港製糖的企業家計畫在暹羅發展農業。此外，高月一郎、松岡富雄、赤司初太郎及淺野水泥亦曾計畫拓展其事業。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13.11.19，〈南洋熱漸く熾ん〉。

<sup>18</sup> 《臺灣日日新報》，1917.10.22，〈南洋發展の運動が（五）〉。

<sup>19</sup> 第 2876 冊《大正七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三卷》，第 8 號〈調查課長：片山秀太郎〉。田阪千助為 1904 年早稻田大學法律科畢業生，在台期間歷任多項要職，離開台灣之後曾擔任名古屋市長，後來投入實業界，擔任東北電氣株式會社董事等職。參見：中西利八（編），《工業人名大辭典》（東京：滿蒙資料協會出版部，1939.6），頁 256。

<sup>20</sup> 蔡錦堂，《日本帝國主義下臺灣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4），頁 49～80。

可想而知現階段是無法擔負重責大任，但片山參事官的見識甚深，抱負極大，當能期待該課陣容的漸趨充實。其次，該文主張不妨公開將來所要採取的調查作法及其目的，

翻譯是應當一面進行的工作，至於總督府迄今較少擲地有聲的出版品，比起朝鮮和滿洲的歷史地理及朝鮮的古蹟和國譜可謂相形見绌；再者，社會對於新課並沒有多大的迴響，作者感到不可思議和遺憾，就其所知過去曾有大谷光瑞向總督府力陳設立情報處（Information Bureau），即能介紹南支南洋的情況並提供旅行者、出外工作者及企業家諮問的機關，調查課或相當於此，希望該課從事正確的調查並盡量向社會發表，以及扮演指導機關的角色和完成具權威性的南支南洋百科全書。<sup>21</sup>黃楊生謂其數年之前曾一探滿鐵東京支社內的東亞經濟調查局，於是介紹該局的業務情形，並表示不強求調查課的設備與東亞經濟調查局擁有同等的水準。<sup>22</sup>

1917年1月，《臺灣日日新報》刊載台灣銀行池田常吉對於台灣經濟問題的解決方案，該文從（一）產業設施、（二）金融財政、（三）產業助長機關及（四）產業法制加以立論，範圍包羅甚廣，例如第（一）項當中討論了造林、治水、灌溉、整地、水電、鐵路、道路、輕便鐵道、商港、東部與「蕃界」的開發，故可認為此案是綜合各方意見之結果；其中關於第（三）項，池田主張依循以下的幾種途徑：（1）組織官民聯合的生產調查會；（2）在主要地方設商業會議所；（3）設置有關南支南洋的調查課，以及派遣商務官與實業練習生；（4）在重要地點設立商品陳列所；（5）召開產業講習會，並使專家巡迴指導；（6）創設培養青年的實業學校。<sup>23</sup>

---

<sup>21</sup> 《臺灣日日新報》，1918.8.27，〈調查課の新設に就て〉（上）。關於大谷光瑞（1876~1948）的生平介紹，可參閱：上山大峻，〈大谷光瑞〉，《東洋學の系譜》（東京：大修館，1993.3），頁182~191。

<sup>22</sup> 《臺灣日日新報》，1918.8.28，〈調查課の新設に就て〉（下）。關於東亞經濟調查局的介紹，可參閱：原覺天，《滿鐵調査部とアジア》（東京：世界書院，1986.7），頁74~95。

<sup>23</sup> 《臺灣日日新報》，1917.1.7~12，〈台灣經濟施設〉（一）~（五）。池田常吉長期任職台灣銀行，其經歷可參見：上村健堂，《台灣事業界と中心人物》（台北：台灣案內社，1919.3），頁179。

池田常吉所擬定的「私案」，經由報紙披露之後，無疑會收到各界的指教，因此該案並非一成不變。由台灣分館典藏的《臺灣經濟施設要項》可知，本案起稿於 1916 年 4 月臺灣勸業共進會召開之際，曾分發給日本國內與臺灣的知名人士，再經增修而成，成書時間為 1921 年 4 月，亦即已過了 5 年。書中歸納的內容略有改變，分別是（1）設置經濟調查會；（2）擴張調查機關；（3）擴張總督府研究所；（4）設立商業會議所；（5）設置商務官及實業練習生；（6）設立商品陳列所；（7）講習會和巡迴教師。

最明顯的變化莫過於第（2）項與第（3）項，前者略謂：總督府近來雖然設立了調查課，但關於產業和經濟等的根本調查，不僅是非常困難的事業，也是一切設施和經營的基礎，故而需要充分加以擴張，期能萬無一失；後者略謂：研究所乃是為本島的產業與衛生之研究而設立的機關，在產業發展上裨益之處甚多，今後務須再加擴張並能切合實際情況，用以貢獻於產業的發展。<sup>24</sup>由此可知，主流的意見認為應同時擴張調查課與中央研究所，以促進台灣產業的發展，反映出對於調查課依然保持甚高的期待。<sup>25</sup>

## 二、組織與功能之演變

1918 年 6 月，總督府以訓令第 96 號將官房統計課改為調查課，並規定其負責（一）南支南洋等海外的制度與經濟調查、（二）統計的製作與報告及（三）統計的監督事項。<sup>26</sup>1924 年 12 月，總督府公佈訓

---

<sup>24</sup> 池田常吉（草擬），《臺灣經濟施設要項》。

<sup>25</sup> 根據池田後來所寫的文章，他曾向明石元二郎總督提出以台灣基礎而從經濟上經營南方的具體議案，明石對他的想法表示贊成，也進行了相當的調查，並且在上京時帶了此案返日，但不幸於門司發病而後逝世，南方經營案遂未能實現；該案係計畫將總督府所有的土地（約 1 千萬圓）資本化，以持有總額約 5 千萬圓，進而成立台灣拓殖興業株式會社。其中關於南支南洋的事業包括：輪船公司的創立、各種經濟作物的拓殖事業、商貿公司的創立、中國的電力事業、中國的製造工業、礦山事業、土地建築的經營、特殊金融機關等。參見：池田常吉，〈南方經營への關心を喚ぶ〉，《台灣大觀》，頁 282~284。

<sup>26</sup> 《府報》，1918 年 6 月 6 日號外。

令第 102 號，據之，調查課除上述三項業務之外，另外新增 1 項「依特別命令而進行制度與經濟調查」。<sup>27</sup>

調查課始終從事統計的相關業務，南支南洋的調查則持續至 1935 年 9 月，而移交給新成立的外事課。外事課於 1924 年被廢止，據說當時在官制會議上，因為某位上司基於個人的因素而罷免外事課長，課員們遂被編入官房文書課的外事係之下。<sup>28</sup>十年之後，隨著局勢改變，時人開始主張恢復外事課，並且期待其能成為有關南支南洋方面最具權威的機關。<sup>29</sup>

總督府於 1934 年 7 月召開對岸領事協調會議時，日本駐福州總領事宇佐美珍彥提議恢復 1924 年以前即有的外事課，駐廈門領事塚本毅及外務省書記官田尻愛義也都加以呼應；翌年，該課因官制改變終於再度設置，並由外務省出身的坂本龍起擔任課長，肩負南支南洋業務的統整及作為內、外地的聯絡機關之責任。<sup>30</sup>根據訓令第五十五號，外事課的職權計有七項，除了南支南洋的調查之外，尚包括有關外國人、外國護照、外文的翻譯、西文電信符號、海外情況的介紹，以及其它一般的涉外事務。<sup>31</sup>1938 年，總督府將外事課改稱為外事部。該部從官房獨立出來的構想被列入 1939 年度預算之後，經日本中央政府討論，1940 年 3 月終於正式設立。<sup>32</sup>

總督府重新設立外事課，必然會影響調查課的定位。尤其，上述領事會議結束之後，即有人主張調查課僅保留統計係，其餘全歸外事課管轄。<sup>33</sup>南支南洋調查由外事課接辦之後，該課的業務勢必有所更動，其中較為顯著者包括資源調查、總動員業務及家計調查。先是，

---

<sup>27</sup> 《府報》，1924 年 12 月 25 日號外。

<sup>28</sup> 《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第 18749 號，1934.1.13，(五)，〈總督府内に外事課復活か〉。

<sup>29</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4.8.3，〈台灣と南支關係の調整〉。

<sup>30</sup> 長岡新治郎，〈南方施策と台灣總督府外事部〉，《鎖國日本と國際交流》下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2），頁 621~644。

<sup>31</sup> 《府報》，1935 年 9 月 2 日號外。

<sup>32</sup> 鈴木斗人，〈法務局及外事部の設置に就て〉，《台灣時報》第 245 號（1940.5），頁 20~29。鈴木寫作本文時，擔任審議室事務官。

<sup>33</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4.8.1，〈外事課の復活と機能發揮の方法〉。



日本於 1918 年 4 月公佈軍需工業動員法，台灣總督府由內務局加以統籌，地方單位則配合執行，到了 1924 年，中央負責的單位改為殖產局。<sup>34</sup>1929 年 12 月，日本實施資源調查法，同時廢止原有的軍需調查令，台灣總督府亦同步以府令第六十九號公佈台灣資源調查令，並且開始進行相關的作業。<sup>35</sup>資源調查法與軍需工業動員法的實施，以及資源的統制運用計畫之設定，原係殖產局商工課主管，總督府於 1930 年 9 月決定交由調查課負責。<sup>36</sup>

資源調查於 1936 年度躍升為調查課第一順位的業務，總督府當年以訓令第三十五號設立台灣資源調查委員會，9 月派員參加內閣資源局召開的資源調查與總動員計畫事務協調會，12 月則召集各州廳的相關官員進行協調會議。<sup>37</sup>台灣資源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審議有關資源的統制運用計畫，委員長為總務長官，委員則是總督從高等官與陸、海軍所屬職員中加以任命，另有幹事和書記若干人。<sup>38</sup>

1937 年 1 月，總督府召開臺灣資源調查第一回委員會，資源局總務部長植村甲午郎藉此表達對以燃料為主的礦物資源的關心，於是調查課創刊《臺灣資源》，以積極回應中央政府；中、日二國爆發戰爭之後，9 月日本內閣議決「國家總動員計畫要綱」，10 月企劃院取代資源局，成為戰時管理物質和人力資源的中樞機關。<sup>39</sup>

---

<sup>34</sup> 第 10511 冊《昭和九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一卷》，第 3 號〈資源調查ニ關スル臨時職員定員配置ノ件〉。

<sup>35</sup> 戶水昇，〈資源調查法に就て〉，《台灣時報》第 125 號（1930.4），頁 6~13。

<sup>36</sup> 臺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1930 年度，頁 134。

<sup>37</sup> 臺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1936 年度，頁 137。日本於 1918 年制定軍需工業動員法與軍需調查令，同時，設置軍需局；該局後來併入內閣統計局，成為國務院第二部，1921 年歸農商務省管轄。1927 年 5 月，始有資源局之設立，作為專門負責的中樞機關。參見：山本真平，〈國家總動員準備を確立せよ〉，《台灣資源》第 1 號（台北：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1937.6），頁 9。

<sup>38</sup> 〈台灣總督府資源調查委員會の件〉，昭和 11 年《密大日記》第 5 冊。（資料來自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本則資料係台灣軍參謀長荻洲立兵向陸軍省所作的通報，顯示軍方相當關心台灣的資源問題。

<sup>39</sup> 近藤正己，〈臺灣の勞務動員〉，《近代日本の歴史的位相—國家・民族・文化—》（：刀水書房，1999.11），頁 160~162。植村為 1918 年東京帝大政治學科畢業生，長期任職日本中央政府，直到 1941 年底轉任煤炭統制會理事長；戰後被褫奪公職 5 年，1952 年底擔任經濟團體連合會副會長，1968 至 1974 年

同時，調查課著手進行國家總動員業務；總督府以內閣於 9 月議決的「國家總動員計畫要綱」為指導原則，並且設立臨時情報部（8 月）、國民防衛本部、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及臨時勞務部（9 月）；同時，也與其它單位針對相關的事務進行協調，或計畫，或加以實施，包括警備、氣象報導、貿易對策、軍需工業動員法、生產力的擴充、經濟封鎖、家畜防疫、總動員法案、飼料對策、醫藥用品的進出口與管理，以及資源的存量與回收之調查。<sup>40</sup>1938 年度，調查課並持續進行相關的業務。<sup>41</sup>

至於家計調查，調查課實施之前，殖產局農務課已不時進行有關台灣農業的各種基本調查。<sup>42</sup>當時，日本國內由於米穀統制法的規定，1931 年以降每年從 9 月至翌年 8 月實施本項調查。<sup>43</sup>總督府期望透過本項調查，以謀求家庭生活的合理化、消費的預算化，進而擬訂物價對策等相關措施。<sup>44</sup>

簡言之，總督府進行家計調查的目的在於觀察各個家庭如何賺取薪水與工資等基本收入，以及如何消費於衣食住、育兒、教育、保健、交際、修養、娛樂等，利用其結果以究明家計的實際情況，除了讓每戶知道收支均衡的基準，也能提供各種社會政策的基礎資料。調查的範圍是在實施市制的地方及其鄰近街庄，選定受薪生活者（日本人家庭 170 戶、台灣人家庭 230 戶），以及勞力工作者（日本人家庭 240 戶、台灣人家庭 360 戶），合計 1000 個家庭；調查時間從 1937 年 9

---

間進而擔任該會會長。參見：秦郁彥，《戰前期日本官僚制の制度・組織・人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11），頁 44~45。

<sup>40</sup>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1937 年度，頁 146~148。

<sup>41</sup>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1938 年度，頁 169~170。當時，調查課也曾解說國家總動員法與相關法令的內容。參見：《台灣時報》臨時增刊號（1938.7）。

<sup>42</sup> 其中關於農家生計費的資料，包括《農家經濟調查》（1920、1923、1930 年出版）與《米作農家生計費調查》（1938 年出版），後者係針對 1936 年 8 月至 1937 年 7 月間的情況，簡單調查台灣各地的中等農家 250 戶之結果。參見：伊大知良太郎，〈台灣家計に現はれたる支出の所得弾力性に就て〉，《南邦經濟》第 9 卷 2 號（台北：台北高等商業學校南邦經濟學會，1941.3），頁 58~59。

<sup>43</sup> 大竹孟，〈台灣に於ける家計調査に就て〉，《台灣時報》第 214 號（1937.9），頁 1~13。

<sup>44</sup> 調查課長，〈家計調査に就て〉，《台灣時報》第 217 號（1937.12），頁 122~125。

月起為期一年，1939 年度完成。在權責的分配上，中央機關方面由官房調查課負責，在事務官與統計官之下，除了臨時新增專任府屬一人之外，也配置雇員十人；地方機關方面，則由州知事全權統籌，其下的市尹、街庄長及家計調查員奉命辦理調查事宜。總督府編列的 1937 年度家計調查費預算為 29,862 圓，調查課的組織包括事務官二人（其中一人為課長）與統計官一人之外，計有府屬八人與雇員三十三人，其詳細情形如表 2-1-1 所示。惟根據官房企畫部出版之結果，顯示實際完成家計簿的登記並符合要求的家庭，台灣人方面有三百九十個家庭，日本人則有三百五十五個家庭。<sup>45</sup>換言之，有七成以上的對象配合該項調查的實施。

表 2-1-1 戰時調查課的組織情形

職稱	人員	工作事項
庶務掛	府屬 1 人 雇員 4 人	1.文書的收發與編纂 2.人事與會計 3.課長的官印與課印之保管 4.不屬其它掛所主管之事項
資源掛	臨時府屬 3 人 臨時雇員 5 人	1.資源調查法的實施 2.資源的統制運用計畫之設定 3.軍需工業動員法的實施
統計掛	府屬 3 雇員 14 人	1.台灣總督府報告例 2.台灣總督府統計書之編纂 3.人口動態調查 4.算定人口 5.犯罪統計 6.統計的監督 7.其它統計事項 8.依特別命令所進行的制度與經濟調查
家計 調查掛	臨時府屬 1 人 臨時雇員 10 人	1.家計調查實施規則之制定 2.家計調查實施細則之制定 3.調查手續與方式的制定 4.調查事項與登記方法的制定 5.家計調查的指導與監督 6.家計簿的檢查、整理及其結果的編纂

<sup>45</sup> 台灣總督官房企畫部，《自昭和十二年十一月至昭和十三年十月家計調查報告》（台北：該部，1940.3），例言。

資料來源：昭和十二年《公文類聚》第六十一編，〈台灣總督府部內臨時職員設置制中ヲ改正ス〉。（資料來自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第二次大戰發生前後，調查課由於進行各種配合時局的業務，因此與其它單位之間的聯繫相當密切。例如台灣於 1938 年 7 月之後實施石油消費的調整，因為考量會帶給車輛事業很大的影響，交通局乃向各州廳發出節約對策的通知，並且在樹立根本方針的同時，保持與調查課及殖產局的密切聯繫。<sup>46</sup>國家總動員業務雖然以調查課為主體，惟實際上分散於金融課、商工課及交通局等，故甚早即有調整以設置新的綜合機構之聲音出現；1939 年 6 月，設置官房企畫部的訓令案，已由審議室加以立案中。<sup>47</sup>該部可說是總督府仿效日本國內的企畫院而設之單位。<sup>48</sup>

1939 年 7 月，總督府以訓令第五十一號在官房之內新設企畫部，正式取代調查課的職權。該部負責的業務包括（一）生產力擴充的基本計畫；（二）物資供給的基本計畫之設定；（三）物資的配給比例與消費調整的基本計畫之設定；（四）情報與宣傳的聯絡調整及不屬於其它單位的情報與宣傳；（五）上述 4 項以外的國家總動員之基本計畫；（六）就上述各項計畫所需的重要預算與財務局進行溝通；（七）資源調查；（八）統計的監督、製作及報告；（九）國勢調查。<sup>49</sup>

1934 年度，總督府曾增加四名府屬作為臨時職員，其中三人配置於官房調查課，另一人則是在殖產局礦務課，進而在 1937 年度又增加事務官一人、府屬二人及技手一人，並將他們分配到調查課，地方廳也增加六名技手；然而，隨著資源調查事務的持久化，總督府認為有必要重新編組上述的臨時職員，即事務官一人、府屬六人及技手一人，使其成為經常職員，除了保留一名府屬給殖產局礦務課礦政係之外，

---

<sup>46</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8.10.27，〈石油規正に依る影響は最少限度〉。

<sup>47</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9.6.1，〈督府に企畫部〉。

<sup>48</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9.6.28，〈官房企畫部開設〉。

<sup>49</sup> 《府報》，1939 年 7 月 1 日。另可參見：臺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1936 年度，頁 163~169。

其餘七人則歸屬於官房企劃部第一係。總督府所編列的 1939 年度資源調查費預算為 52,958 圓，至於該部在人力的安排上，計有事務官五人、統計官一人、技師二人、府屬十九人、技手五人，共計三十二人，其詳細的工作事項如表 2-1-2 所示。

表 2-1-2 企畫部的組織情形

係別	人員	工作事項
部長	事務官 1 人	
庶務係	府屬 1 人	庶務相關事項
第 1 係	小計 11 人，包括： 事務官 2 人（兼任 1 人） 技師 1 人（1 人兼任） 府屬 6 人（1 人兼任） 技手 2 人（1 人兼任）	1.資源調查 2.生產力擴充基本計畫的調查與設定，以及與中央的聯絡 3.資金動員基本計畫的調查與設定，以及與中央的聯絡 4.情報與宣傳的聯絡調整 5.針對總動員計畫進行的重要預算，負責與財務局聯絡 6.不屬其它係所主管之國家總動員基本計畫的設定事項
第 2 係	小計 10 人，包括： 事務官 1 人 技師 1 人 府屬 5 人（1 人兼任） 技手 3 人	1.物資供需基本計畫的調查與設定，以及與中央之聯絡 2.物資的配給比例與消費調整之基本計畫的調查與設定
第 3 係	小計 4 人，包括： 事務官 1 人（兼任） 府屬 3 人（1 人兼任）	1.關於國民徵用的基本計畫之調查與設定 2.勞務供需基本計畫的調查與設定，以及與中央之聯絡 3.關於工資等勞動條件的調整之基本計畫的調查與設定 4.交通與動力基本計畫的設定，以及與中央的聯絡
第 4 係	小計 5 人，包括： 統計官 1 人 府屬 4 人	1.統計的監督與指導 2.不屬其它單位的統計之調查與報告事項 3.國勢調查 4.家計調查

資料來源：（1）昭和十五年《公文類聚》第六十四編，〈台灣總督府官制中ヲ改正ス〉（資料來自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2）第 10415 冊《昭和十四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 號〈總督官房企畫部設置ノ件〉。

1941 年，企劃部的陣容更形增強，包括勅任官部長一人、事務官

七人、理事官一人、技師五人、統計官一人、府屬三十五人、技手十一人；其組織分成庶務係、企畫課、物資課、勞務課、統計課；此外，該部也與陸、海軍建立緊密的關係。<sup>50</sup>隨著戰爭持久化，總督府官房的性質逐漸蛻變。1941年8月，官房內部設置總務室，其功能在於奉命針對重要政策提出意見，使總督府政務能確保完整、迅速及彈性。換言之，該室扮演總督與長官的智囊角色。<sup>51</sup>官房更為重要的業務為情報宣傳。總督府於1942年4月進行情報課的成立事宜，經過二次審議，6月公佈訓令第七十七號，規定該課由總務係、情報係、啓發係及藝能係構成，其業務包括推進皇民奉公運動等。<sup>52</sup>此外，情報課並且發揮聯絡、調整總督府與軍方之功能。<sup>53</sup>

要之，日本於1930年代逐步走向戰爭之路，其一舉一動深刻影響殖民地台灣<sup>54</sup>，官房調查課的性質也從南支南洋的調查，轉變為總督府進行動員業務的核心機關，調查的對象也漸從島外轉移至島內，而隨著戰爭的複雜化，物資、勞動力等成為最迫切的問題時，調查課也被改稱為企畫部，該課雖然在制度上消失了，但以其長年累積的統計等方面的經驗，無疑的仍繼續在新的制度下發揮一定的功能。

## 第二節 人事任用及其特色

---

<sup>50</sup> 鈴木斗人，〈昭和十五年度に於ける台灣總督府官制改正に就て〉，《台灣時報》第255號（1941.3），頁12~16。鈴木撰寫本文時，其身分是審議室事務官。附帶一提，調查課於1937年11月曾以國家總動員計畫事務的名義，而任命鈴木斗人、山口一夫及滿富俊美。參見：第10091冊《昭和十二年十、十一、十二月高等官進退原議》，第74號〈總督官房調查課兼務ヲ命ス〉。

<sup>51</sup> 第10457冊《昭和十六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六卷》，第4號〈總督官房二臨時ニ總務室ヲ置クノ件〉。總務室並無實質的決策權，但作為日人主流輿論的《臺灣日日新報》對此一機構抱持相當大的期待。參見：《臺灣日日新報》第14883號。

<sup>52</sup> 值得注意的是，當局在立案的過程中，曾參考情報局、滿洲國弘報處及朝鮮情報課三個機構的編制概要。參見：第10473冊《昭和十七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四卷》，第11號〈臺灣總督府官房情報課事務分掌規程制定ノ件〉。

<sup>53</sup> 寺崎隆治（編），《長谷川清傳》（東京：長谷川清傳刊行會，1972.1），頁130。

<sup>54</sup> 詳閱：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台北：允晨，2003.2）。

## 一、首任課長片山秀太郎

片山秀太郎為 1905 年京都帝大法科畢業生，翌年 1 月出任總督府專賣局書記，先後歷任多項官職，以及十餘種委員，1923 年以疾病為由辭去台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校長兼參事官 2 職。<sup>55</sup>1918 年 6 月，調查課首任課長由片山雀屏中選，除了因為他是成立該課的起草人之外，還有其它客觀的因素。其被任命為調查課長時，身分是法務部民刑課兼監獄課勤務暨參事官<sup>56</sup>，除了地位隆高之外，1916 年 4 月，南洋協會台灣支部成立時，有幹事 9 人、評議員 48 人，片山亦名列其中。<sup>57</sup>因此，總督府在 1910 年代積極展開南方活動時，可以說片山是其中的重要人士。<sup>58</sup>

片山對於台灣的情況相當了解，並且具有海外調查的經驗。1916 年，在橫濱召開的第 1 回移殖民夏期講習會的演講裡，片山提到自己的考察經驗，包括香港、膠州灣、青島及哈爾濱，觀察外國人經營的結果，認為沒有像台灣在物質上如此進步的地方，台灣甚至回饋砂糖消費稅給日本國內，也生產佔全國消費八成的糖。<sup>59</sup>又如上所述，1917 年總督府派出的幾位考察人員當中，片山亦是其中之一，他的報告《南洋調查復命書》後來列入《南支那及南洋調查書》第 26 輯。

1920 年 5 月，片山轉任台北高等商業學校校長。<sup>60</sup>時論評價片山作為教育家的手腕，與參加府政樞機的當時並無二致，學生將他視為可敬可畏的校長。<sup>61</sup>無論是調查課或是台北高商，片山對自己領導的

---

<sup>55</sup> 第 3756 冊《大正十三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 24 號〈普通恩給証書送付ノ件：片山秀太郎〉。

<sup>56</sup> 第 2876 冊《大正七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三卷》，第 8 號〈調查課長：片山秀太郎〉。

<sup>57</sup> 堀口昌雄，《南洋協會十年史》（東京：南洋協會，1925.2），頁 220~223。

<sup>58</sup> 此外，當時報上也指出他與後藤新平的關係匪淺。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18.7.14，〈綠蔭閑話片山參事官〉。

<sup>59</sup> 片山秀太郎，〈台灣事情〉，《最近移植民研究》（東京：日本移民協會，1917.11），頁 228~242。

<sup>60</sup> 吳文星（等），《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頁 300。

<sup>61</sup> 活殺自在居士，〈學校長批判記〉，《實業之台灣》第 13 卷第 4 號（1921.4），頁 34。

機構之人事安排，都有明顯的方針。1924年7月，儘管台北高商校長豐田勝藏在位不滿一年即被任命為福井縣知事，報紙刊登社論表達敬意，同時指出該校師資來源的特徵，並陳述相關意見以供當局酌採，略謂：設立之初，因民政長官下村宏曾為東京高等商業學校講師，故欲以該校出身者組成教授團，然而隈本繁吉校長和下村兩氏相繼去職後，繼任者為片山秀太郎校長，傳出他要引入母校京都帝大出身者為教授以鞏固自己的周遭。目前高商的教授們大部分是京都帝大畢業，因此兩校出身者之間的關係微妙，無庸諱言，此誠然是令人遺憾的現象；新任校長應用心留意，務使校內無結黨之情事；該文接著呼籲當局一改過去以行政官轉任校長，而從教育界選擇適任者，並希望其作為南支南洋使命的發起人，不僅必須胸有成竹，且能積極釀成風氣，並妥當安排畢業生的出路。<sup>62</sup>

事實上，京都帝大畢業生在台灣的政商二界都有一定的發展規模。主持舊慣調查的岡松參太郎於1921年12月去世，得年五十一歲，《台法月報》極度推崇他的學養與業績，並且指出在台灣有不少人是他的優秀門生，並且正嶄露頭角。<sup>63</sup>12月18日下午在台北八甲庄法華寺舉行的追悼會上，台北高商校長片山秀太郎代讀賀來總務長官的弔文，而京都大學出身者代表片山的部分，則由三卷俊夫代為宣讀。<sup>64</sup>片山並在翌年寫了二篇紀念岡松的文章。<sup>65</sup>

片山秀太郎個人著作能力相當充沛，對於調查課的成員應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他先後投了幾篇文章在雜誌《實業之台灣》，寫作的題目

---

<sup>62</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4.7.29，〈高商校長の選任に就いて〉。

<sup>63</sup> 彙報，〈嗚呼岡松法學博士〉，《台法月報》第16卷第1號（1922.1），頁64~65。關於岡松與台灣舊慣調查事業的新近研究，可參閱：吳豪人，〈岡松參太郎論〉，《戰鬥的法律人—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賀論文集—》（台北：元照，2004.1），頁536~553。

<sup>64</sup> 參見：《臺灣時報》第31號（1922.2）。

<sup>65</sup> （1）片山秀太郎，〈岡松博士と台灣の立法〉，《臺灣時報》第31□（1922.2），頁18~23。片山認為岡松身兼大學教授的名譽與立法家的重要職務，但二十年畢竟太快了些，因此毋庸否認缺陷的存在，尤其法案審查的事業在內地延長主義之下，多少減低了它的價值。

（2）片山秀太郎，〈岡松博士の大著「台灣番族慣習研究」出づ〉，《臺灣時報》第34號（1922.5），頁6~11。片山介紹新書《台灣番族慣習研究》，並說明岡松何以投入此一事業，及其志向為何。



頗為廣泛，但大抵不離個人與社會及國家的關係，許多文章是在擔任台北高商校長時所寫，也可以說他在扮演青年導師角色的同時，也將自己吸收新知的成果供人作為參考。<sup>66</sup>

從醫師吉田坦藏所開立的診斷書可知片山的過度認真導致他神經衰弱，略謂：

1919年1月曾染患流行性感冒而引起肺炎，之後即有輕度的神經衰弱，近二、三年來因研究思想問題、教育問題等，頗為傷神，1922年夏天起，頭有異狀，就醫後雖一度輕快，最近病情轉惡，服藥亦不見多大的效果，夜間不眠，全身疲憊，情緒容易激動，時而心悸亢進，倦於職務。……本病雖無生命上的危險，但難以治癒，應停止工作，轉到氣候良好的地方，以安身靜神，並且施加醫療。

1923年12月底，片山因工作特別認真，獲得了3680圓的獎賞。<sup>67</sup>片山為人認真，無怪乎時人以為若將在各方面的行業發揮渾身之力者，廣義解釋成運動員，片山則是其中的大選手。<sup>68</sup>

片山秀太郎以疾病為由辭官，但他並未就此結束調查工作。<sup>69</sup>片山後來轉往北方的滿洲去發展。根據報載，片山於1925年9月辭去由後藤新平擔任總裁的日露協會學校之校長，繼任者為原台北州知事的高田富藏。<sup>70</sup>日露協會學校為日露協會的主要事業之一，而台灣出身

---

<sup>66</sup> 相關的文章如下：〈服從と義務〉(1916.4)、〈米國の富力に就て〉(1920.7)、〈實業家の金儲けは正義なり〉(1920.9)、〈東西文化の岐點如何＝敢て此書を實業青年に贈る〉(1920.11)、〈民族論〉(1921.12)、〈何ぞ其本に反らざる〉(1921.1)、〈支那思想の由來と其表現〉(1921.6)、〈歐洲文明の淵源と趨向〉(1921.8)、〈瓜の蔓に茄子を接ぐの事態〉(1921.9)、〈歐米の防貧と救貧事業〉(1921.10)、〈階級論〉(1922.1)，以及〈最近に於ける宗教の傾向〉(1923.1)。由於台灣分館所典藏的本套雜誌並不完整，因此遺漏在所難免。

<sup>67</sup> 第3747冊《大正十二年十一、十二月分高等官進退原議》，第42號〈陞敘一等、依願免本官：片山秀太郎〉。

<sup>68</sup> 田中一二，《台灣の新人舊人》，頁518。

<sup>69</sup> 在檔案裡經常可見以「神經衰弱」提出辭呈者，不過有時可能只是藉口而已。例如，吳濁流即曾寫道當他再也不願待在教育界時，「便與一位本島人醫生商量，請他出一紙神經衰弱的診斷書……這時我才四十一歲，正當盛年。侈言隱居，未免太早」。參見：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前衛，1989.11)，頁117~118。

<sup>70</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5.9.20，〈高田富藏氏校長任命〉。

根據同一版面的〈クチナシ〉，該校位於哈爾濱，而片山之所以辭職，則是因

的人士與該校則有一定程度的關聯。<sup>71</sup> 1935年4月，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回覆日露協會會長齋藤實的文字中，對於高田富藏辭去哈爾濱學院院長，並由三澤糾接任一案，表示並無異議；三澤曾經於1925年4月至1929年11月擔任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校長。<sup>72</sup>

雖然目前無法確知片山的具體活動為何，但以他在台灣累積的豐富資歷，無疑會相當受到重視。幸而，根據片山在《辜顯榮翁傳》裡的文字，可以略窺片山離台之後的作為。片山離開台灣之後前往滿洲從事對俄國的調查，當時辜氏為奉天政府的財政顧問；片山後來回到東京，1935年秋天因杉山茂丸進行日、中兩國關係的調整，而受杉山托付照料辜氏在日的政治活動，2人始有親近相談的機會，並建立起友誼；當台北召開博覽會時，辜氏告訴片山可以來台一趟，期間並向片山說明必須推動使日本人活躍於福建的工作；辜氏也曾問過片山關於俄國的情形，片山認為此與辜氏將台茶販賣滿洲，以及與擔任滿洲財政顧問有關。<sup>73</sup>此外，資料顯示片山於1936年當選眾議員。<sup>74</sup>

要之，片山秀太郎在台灣歷任多項要職，1918年擔任調查課長，後來轉任培養調查人員的台北高商校長，離開台灣後，仍然以調查和教育為志業，雖然其行政風格有招人非議之處，但無可否認，片山在調查與著作上以身作則，對於總督府的南方調查之展開，具有相當程

---

其與學生在新舊思想上的衝突，導致了集體罷課之故。

<sup>71</sup> 日露協會創立於1906年4月，主要事業包括：俄國的經濟與文化情況之介紹、日俄二國的經貿發展之聯絡、二國人士互訪的橋樑，以及哈爾濱商品陳列館與日露協會學校的經營；關於後者，後藤新平在1920年9月自己擔任創立委員長，為了養成從事俄國公私業務的人才，依據專門學校令，而設立該校。參見：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4卷（1938.7），頁791~793。

<sup>72</sup> 《外務省記錄》，〈哈爾濱學院關係一件 第三卷 7・哈爾濱學院長更迭ノ件〉。（資料來自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sup>73</sup> 片山秀太郎，〈偉大なる足跡〉，《辜顯榮翁傳》（臺北：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1939.6），頁455~461。據此可知，片山與辜氏相識於1906年，片山當時任職專賣局，局長為中村是公；辜氏因經營鹽務總管的緣故，屢屢出入該局，惟兩人的來往僅止於公事，而無甚私交。

杉山茂丸與台灣的關係頗深，就人際網絡而言，桂太郎、兒玉源太郎及後藤新平皆是其友人，據說後藤向杉山請益許多事情。參見：一又正雄，《杉山茂丸—明治大陸政策の源流—》（東京：原書房，1975.12），頁63~66、288~289。

<sup>74</sup> 佐藤源治，《台灣教育の進展》（臺北：台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1943.7；成文，1999.6），頁156。

度的影響，自不待言。<sup>75</sup>

## 二、 初期的人事佈局

片山秀太郎擔任調查課長期間，除了沿用原有的統計人員之外，翻譯人才與經濟官僚也是任用的對象，尤其日後擔任課長的鎌田正威、吉岡荒造、東鄉實，以及原口竹次郎都在此時已進入了調查課。根據《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與《府報》，從片山課長以迄東鄉課長任內，調查課的人事情形如表 2-2-1 所示。

表 2-2-1 調查課初期的人事構成情形

時間	姓名	原職與其他	任命
1918 6.6	堤一馬	府屬	國勢調查部兼調查課勤務
	右田留造		
	真倉民治	府屬	調查課勤務
	松浦儀一		
	森田正輝		
		高木寅次郎 與另 21 人	雇
6.6	下村庸	警部、府屬	調查課勤務
	出田虎武	警部、府屬	調查課兼國勢調查部勤務
	岡元男	雇	務
	池田斌	法務部勤務、府屬	調查課兼務
6.7	福田真鷹	統計官	國勢調查部兼調查課勤務
6.13	小川尙義	翻譯官	調查課兼務
	關口長之	囑託	
	法水了禪	外事課勤務、翻譯官	
	關善之助	文書課勤務、府屬	
	執行碩二	府屬	
6.13	34-1158 原口竹次郎	舊慣調查會囑託	調查課勤務
6.14	花香伯貢	專賣局書記	兼任府屬、調查課勤務
	前田稔靖	財務局勤務、府屬	調查課兼務

<sup>75</sup> 關於片山晚年的情形，目前僅知根據 1959 年 10 月出版的《台灣關係人名簿》（橫濱：愛光新聞社），片山當時為「龍王教會長」，住家為東京都世田谷區。

6.18	東鄉實	殖產局農務課勤務、技師	調查課兼務
	鎌田正威	土木局庶務課長、事務官	
	菊池武方	財務局主計課長、事務官	
	水越幸一	地方課長兼地理課長、事務官	
	齋藤參吉	營林局囑託	調查課勤務
6.25	越村長次	外事課勤務、通譯	調查課兼務
	莊司捨藏	外事課勤務、府屬	
7.3	吉岡荒造	事務官	調查課勤務
	川淵洽馬		
7.11	白勢黎吉	事務官	調查課勤務
1919 5.6	藤野幹	殖產局糖務課長、事務官	調查課兼務
7.3	高木寅次郎	調查課勤務、雇	府屬、調查課勤務
7.4	前田稔靖	財務局金融課勤務、事務官	調查課兼務
11.17	片山秀太郎		卸任課長
	鎌田正威		調查課長兼外事課長
11.26	神社柳吉	殖產局糖務課長、事務官	調查課兼務
12.26	白石新藏	國勢調查部勤務、府屬	調查課兼務
1920 3.26	中澤亮治	總督府研究所釀造學部長、技師	調查課兼務
3.31	豐田治長	國勢調查部兼調查課勤務、府屬	調查課專務
5.3	田澤震五	電力會社計師	殖產局兼調查課勤務
5.13	中村鐵次郎	警務局勤務、府屬	國勢調查部兼調查課勤務
5.18	近藤關璽	調查課兼國勢調查部勤務、府屬	國勢調查部兼調查課勤務
5.28	高木寅次郎	調查課勤務、府屬	國勢調查部兼調查課勤務
7.15	松本忍	土木局勤務、府屬	調查課兼務
7.31	松本政三郎	秘書課兼秘書官室勤務、府屬	調查課兼外事課勤務
8.10	小森德治	原為台灣日日新報社記者，時任殖產局囑託	調查課勤務，負責統計與南支南洋調查
1921 2.2	生駒高常	內務局學務課長、事務官	調查課兼務
	川崎末五郎	警務局保安課長、事務官	
5.2	藤森益美	國勢調查部勤務、府屬	調查課兼務；3月從新竹州郡屬轉任府屬，上級原本有意使其亦兼任調查課勤務

5.10	東鄉實	技師	調查課長
5.21	東海龍穩	原為台灣新聞社記者	調查課勤務
5.31	出田虎武	警務局勤務、府屬	調查課、國勢調查部兼務
8.30	遠山靜二		國勢調查部兼調查課勤務；負責翻譯
9.8	吉岡荒造	外事課長、事務官	調查課兼務
9.27	川村直岡	內務局地理課勤務、事務官	調查課兼務
10.15	前田稔靖	財務局金融課長	
12.12	山田朝常	國勢調查部勤務，府屬	調查課兼務；負責統計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府報》。

首先，在調查課從事統計工作者，包括堤一馬、右田留造，以及原先任職於官房統計課的 25 人，他們無須經由任命案而直接任職調查課。<sup>76</sup>不過，調查課成立之初即痛失一位統計官福田真鷹。福田罹患流行性感冒而住進台北醫院，1919 年 12 月去世。<sup>77</sup>福田於 1901 年任職基隆海港檢疫所，1904 年擔任府屬，總計工作長達十八年又八個月；總督府肯定其績效良好，特別上奏使其獲得「最高限度」的待遇。<sup>78</sup>1920 年 3 月，堤一馬繼福田之後成為統計官。<sup>79</sup>堤一馬從事台灣的統計業務長達二十多年，1924 年返回故鄉久留米市。<sup>80</sup>堤氏離開之後，調查課的統計官乃告懸缺，之後才由原口竹次郎長期擔任。

調查課對於具有統計經驗的人才，特別加以珍惜。例如當初因制度改變而直接轉任調查課的真倉民治，1922 年度因預算的縮減，而於 1921 年 11 月底辭職，但由於長年從事統計，尤其具有前二次戶口調

<sup>76</sup> 他們是塩山壽、樽澤茂、山田朝常、井上秀實、周阿斌、曾六瑞、永野新藏、林聯溪、永田榮藏、高久英行、坂脇卯吉、豐田治長、志多伯必仁、清水英輔、中島喜市、清信充、原田英熊、蔡吉龍、吳明旺、楊阿泉、鄭四川。參見：第 2888 冊《大正七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六卷》，第 29 號〈分課規程改正ノ際總督官房統計課勤務ノ者ハ辭令ヲ用ヒス總督官房調查課勤務ヲ命セラレタル義ト心得ヘシ：真倉民治外二十四名〉。警部下村庸原本也在此案當中，或因身分不一而改為另案處理。

<sup>77</sup> 《臺灣日日新報》，1919.12.12，〈福田課長葬儀〉。

<sup>78</sup> 第 2980 冊《大正八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九卷》，第 8 號〈危篤：福田真鷹〉。

<sup>79</sup> 第 3089 冊《大正九年高等官進退原議》，第 20 號〈任統計官：堤一馬〉。

<sup>80</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4.4.3，〈堤一馬氏歸鄉〉。

查的經驗，調查課仍繼續加以聘用。<sup>81</sup>此外，該課統計人員離職後，也有一定的表現，例如池田斌原是 1916 年 9 月繼甲斐鹿太郎之後擔任統計課的犯罪統計事務<sup>82</sup>，後來曾歷任高雄州旗山郡守、鳳山郡守、新竹州苗原郡守、新竹州市尹，辭官之後進入南日本化學工業株式會社，擔任庶務部長。<sup>83</sup>

其次，在翻譯人才方面，具有翻譯官資格者包括關口長之、小川尚義及法水了禪。關口長之擅長中文<sup>84</sup>，1918 年 3 月辭去總督府的翻譯官一職，此後即擔任囑託；然而，後來因罹患腸傷寒，住進台北醫院接受治療，1923 年 12 月初去世，享年 64 歲。<sup>85</sup>從《職員錄》可知，小川尚義和法水了禪二人在最初幾年共同擔任調查課的翻譯官。小川在日治初期即來台灣發展，之後即長期在台任職。<sup>86</sup>

小川除了語言方面的天賦之外，對於台灣歷史也有相當的研究，例如台灣時報發行所於 1928 年出版調查課的成果之一《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其中有關〈漢民族移民之沿革〉即由小川尚義所執筆。<sup>87</sup>本書使研究者能了解清代台灣移民的原籍，論者即據以回溯台灣社會的企業精神之起源。<sup>88</sup>此外，在外事課任職的越村長次與莊司

---

<sup>81</sup> 第 3214 冊《大正十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十二卷》，第 2 號〈統計ニ關スル事務囑託：真倉民治〉。從履歷可知，真倉在 1906 年 4 月辭去內閣統計局的雇員工作，接著來台任雇，1908 年 2 月修畢第四回統計講習會，此後長期從事統計業務。

<sup>82</sup> 第 2588 冊《大正五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九卷甲》，第 25 號〈總督官房統計課兼務ヲ命ス：池田斌〉。

<sup>83</sup> 長里清，《九州文化大觀》（東京：日本文化研究會，1940.12），頁 4~5。

<sup>84</sup> 關口於 1879 年底被參謀本部選為派往清國的留學生，兩年之後回到日本，並長期任職陸軍。其生平詳見：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下）》（東京：原書房，1981.6），頁 229~230。

<sup>85</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3.12.6，〈關口囑託永眠〉。

<sup>86</sup> 小川尚義由於老師上田萬年的勸勉，加上對台灣語言研究的認識，1896 年 7 月自東京帝大博言學科畢業之際，透過上田的介紹認識伊澤修二，同年 10 月被任命為學務部編集事務囑託，1918 年 4 月成為翻譯官，1924 年 12 月擔任台北高商校長，1930 年 3 月當上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教授，1936 年春天結束約四十年的在台生活。詳閱：馬淵東一，〈故小川先生とインドネシア語研究〉，《馬淵東一著作集》第 3 卷（東京：社會思想社，1974.9），頁 485~500。

<sup>87</sup> 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編），《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台北：台灣時報發行所，1928.3），頁 2。

<sup>88</sup> 溫振華，〈清代台灣漢人的企業精神〉，《台灣史論文精選（上）》（台北：玉山社，1997.9），頁 321~355。

捨藏<sup>89</sup>，可視為準翻譯官；前者在 1932 年成為翻譯官<sup>90</sup>，1939 年 12 月辭官進入南洋協會。<sup>91</sup>

在經濟人才方面，調查課一直任命糖務課長為其兼務。1919 年 5 月與 11 月先後有二位殖產局糖務課長被任命，分別是藤野幹與神社柳吉。實則，二人之間還有一位真室幸教，他的任期相當短暫，僅從 9 月底至 10 月中。或許因此而來不及被任命為兼務。<sup>92</sup>

調查課早期的成員當中，前田稔靖不斷受到青睞，值得加以探討。前田為 1915 年京都帝大法科大學政治科畢業生。<sup>93</sup>來台前曾經在大阪市的商工課從事經濟調查，也當過故鄉的《福岡日日新聞》經濟部的翻譯，該報後來欲聘請他為經濟部長，時人田中一二認為他必定會被京都或大阪的報界所延攬，總督府若不想失掉傑出的人才，應趁早讓前田出國留學三年，並安排他在高商當專任教授，因為像他那樣溫厚的人，感激之餘，或許會將一生奉獻給台灣。<sup>94</sup>果然，正如田中所作的隱喻，蛟龍終非池中物，長崎高等商業學校校長田尻常雄於 1922 年 6 月想延聘前田成為該校教授，總督府則加以同意。<sup>95</sup>

前田稔靖也是一位能文善筆的人，田中一二編輯的《台灣事情之宣傳》共有五位作者，其中之一即是身為總督府事務官的前田。<sup>96</sup>此外，他與片山同樣在《實業之台灣》發表多篇文章，內容分成經濟

---

<sup>89</sup> 第 2888 冊《大正七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六卷》，第 73 號〈調查課兼務ヲ命ス：越村長次〉、第 76 號〈調查課兼務ヲ命ス：莊司捨藏〉。

<sup>90</sup> 越村彌補了森新一辭去翻譯官之後的空缺，由於他長期在官房進行外事方面的工作，而得以升任。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2.5.2，〈督府翻譯官の後任決まる〉。

<sup>91</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9.12.13，〈越村氏退官〉。

<sup>92</sup> 真室幸教於 1902 年 2 月來台，先後任職稅關、財務局、糖務局、殖產局，1919 年當台中州大和製糖創立時，他辭官擔任常務董事，該公司後為明治製糖合併，遂轉而進入日佛製糖會社，並前往法屬中南半島，迨該公司讓渡他人，他才回到台灣；真室被尊為糖業的「活字典」，其夫人是宮尾舜治的妹妹。1929 年 4 月過世，享年 63 歲。參見：《糖業》第 16 年 4 號（台北：台灣糖業研究會，1929.4），頁 31。

<sup>93</sup> 參見：《帝國大學出身人名辭典》（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2003）。

<sup>94</sup> 田中一二，《台灣の新人舊人》，頁 492~493。

<sup>95</sup> 第 3448 冊《大正十一年高等官進退原議》，第 18 號〈轉任：前田稔靖〉。

<sup>96</sup> 田中一二（編），《台灣事情之宣傳》（臺北：新臺灣社，1921）。

與殖民二類。<sup>97</sup>當他在 1929 年底出版《植民與經濟》一書時，已經任教於九州帝大了，但從中可見 1922 年的舊稿，有助於吾人了解他的想法。他的觀點是臺灣銀行無法供應當時各種事業所需的資金，若與勸業銀行代理放款資金合計，充其量不過能融通五千萬元左右，亦即在台灣缺少長期且低利的拓殖金融，因此日本勸業銀行開設台灣分店可說是金融上的內地延長主義之成立；但他認為根本的問題，尚包括如何轉變台銀的性質、確立專門銀行的種類，以及展望南支南洋的經營。<sup>98</sup>要之，前田因為具有金融專業的知識與研究能力，於是調查課持續加以任用。前田身為片山秀太郎學弟，也與片山同樣在雜誌上撰寫多篇文章，離台之後除了執教於九州帝大之外，二次大戰期間也往南方去發展。<sup>99</sup>由此觀之，二人之間可說有高度的相似性。

至於在調查課的領導人物方面，繼片山秀太郎之後，鎌田正威接任調查課長。鎌田因受到明石元二郎總督的賞識與信賴，先後擔任秘書官、秘書課長、外事課長兼務；擔任文書課長並兼任外事課長和調查課長時，召開南支南洋調查會並自為會長。<sup>100</sup>由此可見，鎌田同樣是以位居府政核心而負起領導該課的重責大任。鎌田個人在對外調查上留下了一定的業績，報告書被出版者即有第 20 輯《比律賓視察所感》、第 144 輯《新嘉坡阿片、印度阿片》，以及第 148 輯《波斯阿片、土耳其阿片》。<sup>101</sup>

---

<sup>97</sup> 詳見該雜誌，在此不一一列舉。此外，前田在《台灣統計協會雜誌》第 147 號翻譯〈鐵及石炭ト國力トノ關係〉，在第 154 號也翻譯〈北米合眾國ニ於ル地價遞増ノ趨勢〉。

<sup>98</sup> 前田稔靖，《植民と經濟》（東京：積文館書店，1929），頁~。

<sup>99</sup> 目前可知在 1941 年 4 月至翌年 8 月間，前田擔任興亞鍊成所鍊成官，接著任職於興亞院文化部第二課，同年 11 月因官制改變而隸屬大東亞省支那事務局文化課，到了 1943 年 8 月轉任陸軍司政官，以南方軍政要員的身分，被任命為昭南醫科大學預科學生監（馬來軍政監部）。參見：。當時，前田的相關著作刊登在《外交時報》。參見：協同出版社編纂部，《現代出版文化人總覽》（東京：該社，1943.2），頁 688。

<sup>100</sup> 森政禧，〈臺灣維新社と私の使命〉，《鎌田正威先生追想》第 1 輯（台北：臺灣維新社，1936），頁 143~144。

<sup>101</sup> 當時由於鎌田在伊澤多喜男總督時代經手行政整理的事務，不久提出辭呈，專賣局則允許休假，給他每月 300 圓的囑託，並且命令他出國考察，鎌田於是前去研究鴉片問題，最後呈交專賣局寶貴的參考資料和報告，據說自己還掏了三、四萬圓的荷包。參見：田中一二，《台灣の新人舊人》，頁~。



東鄉實為 1905 年札幌農學校畢業生，他來台灣發展乃是因為受到新渡戶稻造的鼓勵。<sup>102</sup>具體而言，東鄉於 1906 年 6 月擔任彰化廳技師（兼南投廳、斗六廳技師），1908 年 6 月任總督府技師，其後曾兼任農事試驗場技師、台北廳技師及中央研究所技師，1924 年 2 月以疾病為由辭去官職。<sup>103</sup>時人橋本白水於 1924 年以官房的人才為題，介紹幾位核心的人物，包括秘書課長小林音八、調查課長東鄉實、專任參事官鼓包美、文書課長下村充郎及外事課長法水了禪；其指出東鄉為台灣農政學者的泰斗，博覽群書而見解新穎，著作頗多並且立論深入，位居要津乃實至名歸，至於法水的語學功力在總督府內則相當有名。<sup>104</sup>

根據 1919 至 1938 年度的《台灣總督府職員錄》<sup>105</sup>，官房調查課的成員由課長、事務官、統計官、翻譯官、技師、屬、通譯、囑託、雇、技手所構成。每年的人數約為 50 人，其詳細情形如表 2-2-2 所示。

表 2-2 歷年調查課的人事構成一覽

時職 間稱	課長	事 務 官	統 計 官	翻 譯 官	技 師	屬	通 譯	囑 託	雇	技 手	合 計
1919.7	片山	5	1	2	1	16	1	2	30		57
1920.12	鎌田	7	1	2	2	19	1	5	29		66
1921.9	東鄉	6	1	2	2	17	1	9	30		67
1922.9	東鄉	3	1	2	2	17	1	4	28		58
1923.9	東鄉	4	1	2	2	16	1	8	17		51
1924.9	小林 (代)	5	×	2	1	12	1	3	30		54
1925.9	下村	4	×	×	1	10	1	3	19		38

<sup>102</sup> 1905 年東鄉自札幌農學校畢業之際，老師們建議他去東京與新渡戶見面，當時正值日俄戰爭講和條約締結不久，東鄉欲前往滿洲發展，但聽過新渡戶說完「臺灣雖小，卻有兒玉、後藤等偉大的人，年輕人去了可以大展抱負」一席話之後，遂打消舊念並轉移目標到臺灣，從此兩人結下近三十年的交情。詳見：東鄉實，〈新渡戶先生を憶ふ〉，《新渡戶博士追憶集》（東京：故新渡戶博士記念事業實行委員，1936.11），頁 110~139。

<sup>103</sup> 第 3760 冊《大正十三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5 號〈普通恩給證書下付ノ件：東鄉實〉。

<sup>104</sup> 橋本白水，《評論台灣之官民》（台北：南國出版協會，1924.2），頁 148~152。

<sup>105</sup> 台灣總督府（編），《台灣總督府職員錄》1919~1938 年度（台北：《台灣日日新報》，1925 年度以降由《台灣時報》發行）。

	(代)										
1926.10	下村 (代)	4	1	×	1	10	1	8	24		49
1927.11	生駒 (兼)	3	1	×	1	6	1	8	28		48
1928.12	和田 (兼)	2	1	×	1	6	1	8	30		49
1929.11	石川 (兼)	1	1	1	1	9	1	8	28		50
1930.12	石川 (兼)	1	1	1	1	10	1	7	31		56
1931.10	川村 (兼)	1	1	1	1	9	1	5	33		52
1932.10	能澤 (兼)	1	1	1	1	9	×	2	29		44
1933.10	能澤 (兼)	1	1	1	1	8	×	2	26		40
1934.10	川村 (兼)	1	1	1	1	7	×	2	39		52
1935.9	川村 (兼)	1	1	1	1	10	×	6	32		52
1936.9	川村 (兼)	1	1	×	1	8	×	1	18		30
1937.10	山本 (兼)	2	1	×	1	8	×	3	33		48
1938.10	木原	7	1	×	4	12	×	5	48	2	77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編），《台灣總督府職員錄》（台北：1925年  
度以前由《台灣日日新報》發行，以後則改為《台灣時報》）。

由上表可知，調查課的統計官在福田真鷹和堤一馬離去之後，長期由原口竹次郎擔任，加以東鄉實以降的課長先後由小林音八、下村充郎、生駒高常、和田一次、石川重男、川村直岡、能澤外茂吉、川村直岡、山本真平、木原圓次代理或兼任，或許因為課長常以事務官兼任，原口竹次郎因此得以扮演領導調查課的角色。

原口辭職後，總督府委託資源局植村總務部長物色適當的人選，於是1937年3月該局統計官補大竹孟接任調查課統計官；大竹為1917年明治大學法科畢業生，先後任職遞信省、國勢院、統計局及資源局。

<sup>106</sup>總督府尋求資源局的推薦，反映調查課的資源業務與日本中央之間的合作關係，大竹不僅可以發揮其專長，也能為雙方建立更緊密的聯繫。

其次，調查課技師初期由東鄉實和中澤亮治二人共同擔任，東鄉離台之後，長期由中澤一人擔任。中澤於 1910 年受鈴木梅太郎推薦，加上堀內次雄的屬意，而任職總督府研究所。<sup>107</sup>其專業為酒類的研究，當時被譽為臺灣釀造界的功臣，1921 年獲授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即為「臺灣所產釀造酵母類之研究」。<sup>108</sup>然而，其對調查課的具體貢獻為何，礙於資料仍不甚明瞭。

### 第三節 調查人員的能力

依照中村孝志的看法，1924 至 1936 年日本經濟界陷入不景氣，南洋熱潮消失不見，台灣總督府一方面補助南洋企業家和小型商工業者的貸款利息，以救其擺脫困境，另一方面則持續南方研究與培養人才。<sup>109</sup>調查課當時負責總督府的南方研究，其日常業務由負責各個地區的調查人員閱讀數十種報紙與雜誌，檢視其中相關的報導與消息，進行剪輯工作，並且配合其它資料，從事各方面的研究。<sup>110</sup>

---

<sup>106</sup> 第 10089 冊《昭和十二年高等官進退原議》，第 78 號〈任臺灣總督府統計官：大竹孟〉。

<sup>107</sup> 小田俊郎（洪有錫譯），《台灣醫學五十年》（台北：前衛，2000.11），頁 102。

<sup>108</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1.5.27，〈本島釀造界の功勞者〉。中澤在 1939 年回到日本國內，1974 年 12 月逝世，享年 95 歲，關於其後半生的簡介，可參見：長谷川武治，〈中澤亮治先生のご逝去を悼む〉，《日本農藝化學會誌》第 49 卷 2 號（東京：日本農藝化學會，1975.2），頁 i~ii。

<sup>109</sup> 中村孝志，〈臺灣と「南支・南洋」〉，《日本の南方關與と臺灣》（奈良：天理教道友社，1988.2），頁 5~6。

<sup>110</sup> 佐多則昭，〈台灣南方調查の回顧〉，《日本植民地史 3 台灣・南洋》（東京：每日新聞社，1978.10），頁 164。1932 年自台北帝大農藝化學科畢業的霜三雄，曾回憶他在總督府工業研究所任職期間，除了實驗之外，其中的一項工作即是節錄每個月許多國內外的專業雜誌。因此，總督府的研究機關必須掌握最新的研究動向，可以說是共通的特色。參見：氏著，〈恩師中澤亮治先生を憶ふ〉，

調查人員爲了處理日常的例行性工作，必須擁有良好的外語能力，以及能夠進行研究的分析能力。調查人員的能力問題，也反映出總督府選用人才的標準何在。本節將以松岡正男、田澤震五、小林里平、板倉貞男、原口竹次郎、吉村周二郎爲例，對於調查人員具備何種才能，從語言和研究二方面加以探討。

### （一）松岡正男

調查課成立之前，《南支那及南洋調查書》已經開始刊行，第一輯爲 1913 年 10 月出版的《南洋諸島視察復命書》，作者是松岡正男。從他身上可以看出總督府挑選調查人員的基本考量。松岡被委託進行世界的殖民地通信行政制度之調查而來台，時爲 1910 年 8 月底，他正巧在船中透過無線電信得知「日韓合邦」，而將他介紹給通信局長持地六三郎的人爲石田新太郎；持地離開後，松岡在民政長官內田嘉吉的官邸從事三好重彥委員長之下的南洋調查，翌年經新渡戶稻造居中安排，得以兼任鹿兒島高等農林學校講師。<sup>111</sup>該校在熱帶有用植物的栽培利用上，則是聘請台灣總督府技師田代安定爲講師。<sup>112</sup>

持地六三郎後來前往朝鮮發展。<sup>113</sup>松岡曾幫忙持地在台收集《台灣殖民政策》一書所需的參考資料。<sup>114</sup>他在所寫的書評中表示該書有

---

《台北帝大理農學部創立 60 周年記念誌》（：，1988.10），頁 73。

<sup>111</sup> 松岡正男，〈始政四十年所感〉，《東洋》台灣特輯號（東京：東洋協會，1935.9），頁 236。石田新太郎自 1900 年 12 月擔任國語學校教授，1912 年 5 月辭職，轉而從事朝鮮的教育行政，然後成爲母校慶應大學的幹事。參見：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台北：作者發行，1927.10），頁 356。

<sup>112</sup> 《福岡日日新聞》，1915.1.1，〈南洋發展策の研究〉。（資料來源：戰前期新聞經濟記事文庫）附帶一提，田代相當年輕即具有一定的外語能力。他於 1872 年隨柴田圭三進入藩校造士館，柴田氏教授法語，年僅 16 歲的田代一邊在中學科，同時也擔任法語的助教；1874 年時，田代又隨柴田進入開物社，並擔當法語的翻譯助手。參見：《田代安定翁》（台灣大學圖書館藏，1930），頁 34。

<sup>113</sup> 台灣總督秘書官在 1912 年 3 月回覆朝鮮總督府人事局長，表示通信局長持地轉任該府的土木局長並無疑義。參見：第 2054 冊《明治四十五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四卷》，第 27 號〈朝鮮總督土木局長ニ轉任〉。關於持地的先行討論，可參閱：金子文夫，〈持地六三郎の生涯と著作〉，《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 2 號（1979.8），頁 119~128。

<sup>114</sup> 持地六三郎，《台灣殖民政策》（東京：富山房，1912.8；台北：南天，1998.5），頁 5~6。

三項價值，即求取第一手的資料、同時記述一般的殖民統治政策，以及抱持最進步的意見；而且持地貴為朝鮮總督府土木局長，令人佩服他出版該書的勇氣。<sup>115</sup>事實上，二人也曾合寫《經濟大辭書》中關於台灣人口的部分。<sup>116</sup>

官房文書課在 1914 年 1 月委聘通信局囑託松岡正男處理圖書業務時，課長鈴木三郎在文件裡即指出他精通外國語文<sup>117</sup>，他的工作持續了一年半<sup>118</sup>，同時也解除通信局囑託一職，而由於已經工作達五年之久，而獲得 250 圓的獎賞。當時通信局長為井村大吉，由職銜可知松岡的另一項工作為通信史編纂。<sup>119</sup>在台期間，松岡還為《台法月報》撰述了不少的文字。<sup>120</sup>1916 年，松岡撰寫送別手島兵次郎的短文時，所屬單位是《東京日日新聞》編輯局。<sup>121</sup>顯然，他回到日本之後，仍有一定的發展。<sup>122</sup>

## （二）田澤震五

1920 年 5 月成為調查課囑託的田澤震五，被賦予的任務是「工業傳習」，意指向台灣人家庭傳授工業，為此必須調查原料並確立製造的方法，以及派人實地教導；田澤於是被委託選擇適合台灣人家庭的工業種類並講求其方法。<sup>123</sup>

田澤震五後來在寫給鎌田正威的悼念文中，透露了有關調查課內

---

<sup>115</sup> 松岡正男，〈持地六三郎氏の台灣殖民政策を讀む〉，《台法月報》第 6 卷第 8 號（1912.8），頁 43~45。

<sup>116</sup> 大日本百科辭書編輯所（編），《經濟大辭書》第 4 卷（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8.6），頁 2084~2085。

<sup>117</sup> 第 2305 冊《大正三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卷》，第 40 號〈圖書取扱囑託ノ件、總督官房文書課勤務：松岡正男〉。

<sup>118</sup> 第 2464 冊《大正四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七乙卷》，第 97 號〈解囑：松岡正男〉。

<sup>119</sup> 出處同上，第 94 號〈囑託ヲ解ク：松岡正男〉。

<sup>120</sup> 彙報，〈松岡正男君送別會〉，《台法月報》第 9 卷第 7 號（19.），頁 115。為松岡送別的團體包括早稻田同窗會，他應該出身於該校。

<sup>121</sup> 松岡正男，〈今昔の感〉，《台法月報》第 10 卷第 10 號（1916.10），頁 19~20。

<sup>122</sup> 根據末野英二在 1941 年 9 月所寫的〈台灣をつたはどしてゐるか〉（刊於《台灣時報》第 261 號），松岡當時為大每東日的董事。

<sup>123</sup> 第 3103 冊《大正九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五卷》，第 54 號〈工業傳習生並ニ海外ニ於ル制度及經濟調査ニ關スル事務ヲ囑託ス：田澤震五〉。

部互動的訊息，略謂：

1920年，本人自電力會社離職，鎌田時為官房調查課長，上田土木局庶務課長和前田稔靖金融課長為我說情，登門拜訪之後，結果成為調查課的囑託，為期二年；本人最初被交付的工作是翻譯《馬尼拉時代》的報導，由於出身大阪高工應用化學科，對學習英文不甚用功，加以畢業之後二十年任職於民間公司，遠不堪勝任，一度累到昏厥。接著，本人從事椰子的研究，乃涉獵與椰子相關的日文及英文的各種書籍，同時，親自視察東部和南部的椰子栽植情況，終於完成《椰子の栽培及其利用》一書，由官房調查課出版。當時，殖產局林務課每年支出數千圓透過三井從南洋購入椰子的種子，向中南部和東部免費發放，並獎勵種植，然無多大成效；本人以為兩處的海岸砂地適合栽植椰子，但時為調查課兼務的「農學博士」東鄉實在本書出版時說道「田澤成天口不離椰子，不過臺灣有更多比椰子還有用的植物」，本人為此面斥東鄉。1921年4月，本人受鎌田之命出差前往南洋，為期五個多月，返台之後撰著《南國見聞記》，以自費出版；其間，鎌田轉任專賣局庶務課長，繼任調查課長者為吉岡荒造，惟吉岡不久升任台南州知事，課長一職由東鄉接掌；迨本人於10月結東南洋之旅回到臺灣，雖贈與東鄉在新加坡所買的禮品，但兩人的關係並未改善，我最後仍被解雇。其後，在前田金融課長的好意拜託之下，本人來到鎌田之處，正巧與前田為同期生的松下鹽務課長也在場贊成，遂得以任職於專賣局，月薪二百三十圓，派令為庶務係，並兼製造課事務，鎌田的用意是要我專心作研究，時為1922年3月。不過，本人曾為自己無法擺脫囑託身份而向鎌田抱怨一番，他卻暗示我多加打拼便有機會升任技師。<sup>124</sup>

田澤的著作相當豐富。<sup>125</sup>1941年，他回顧自費出書的歷程，其寫

---

<sup>124</sup> 田澤震五，〈奇人鎌田正威氏と僕〉，《鎌田正威先生追想》，頁180～200。

<sup>125</sup> 根據田澤自己在1938年2月所作的回顧，他曾經寫過以下的書籍：年輕時代的家族史《蝸牛の寢言》、在大阪高工讀書期間的點滴《海》、由官房調查課出版的《椰子の栽培及其利用》與翻譯海外調查第9輯《食塩及アルカリ工業》、《南國見たまゝの記》、《食用蛙の養殖》、《人格の人渡邊大將》、《殿様榮

道當要出版《南國見聞記》一書時，友人告訴他何不效法報社記者向企業募集廣告換取出版費，於是田澤與上司東鄉實商量此事，但東鄉認為不可而作罷，之後便靠著信件或當面拜託知己們買書，用以支付印刷費用。<sup>126</sup>東鄉實的理由是廣告關係到著書的權威，然而究竟是基於確保調查課成員作品的水準，或另有其他的考量，很難妄加推測。但若從田澤在多年之後仍將此事看作自己人生「惡戰苦鬥」的起點，則他對東鄉的情緒應當未有太大的改變。<sup>127</sup>

無論如何，從田澤震五自述這段陳年往事可知，私情在公務的場域仍可發揮一定的作用，上司與下屬之間透過人脈網絡形成非正式的管道。田澤所以能成為調查課囑託，有機會出差南洋近半年，被解雇之後轉任專賣局，都與鎌田正威的同意有關，鎌田並給予他實質上的加薪與精神上的鼓勵。<sup>128</sup>此外，田澤對東鄉的微詞不啻說明在專業分工之下，各自擁有專精的研究領域，多少不容別人置喙。儘管如此，調查課由於業務特殊使然，對於部屬外語能力的要求及工作份量的負荷，也是該課的一大特色。<sup>129</sup>

### （三）小林里平

---

吉》、《明石大將》、《阿片資料》，此外，尚包括名為《瓦斯の光》的數期小冊，在《台灣日日新報》寫過有關山羊、養雞、食用蛙、蜜蜂等文章，在《實業の台灣》撰寫評論等，以及在《高雄新報》寫過〈小説愛の化身化身小天使〉與〈科學物語〉等。詳見：氏著，〈還暦の年六十一年の〉，《海南島と椰子》（台北：田澤化學工業研究所，1940）。

<sup>126</sup> 田澤震五，〈援助に就いて感謝の辭〉，《非常時局下食料問題解決案》（台北：田澤化學工業研究所，1941），頁1。

<sup>127</sup> 田澤震五對被東鄉實討厭而終究去職，似乎耿耿於懷，他也曾在《殿様榮吉》一書裡將原委簡單地寫了下來。

<sup>128</sup> 田澤在上引〈還暦の年六十一年の〉裡，也提到另一次受貴人相助的經驗，同樣與專賣局有關。田澤在1930年4月成為食塩經銷商，之前他原本陷於失業的處境，家裡又有12個小孩，雖然為他們作了一些出路的安排，但生活仍是困難重重，其後因時任專賣局庶務課長的川村直岡授意要讓他從事食塩生意，加以折尾書記告訴他儘管收入不豐，以後再想辦法換成菸草或酒即可，於是田澤透過小松吉久與許丙的幫忙，終於得以在板橋營業。

<sup>129</sup> 進而言之，總督府官房對所屬人員的英語能力相當重視。例如，1919年7月服務於官房秘書課的瀨戶山兼斌，曾提到時任秘書課長的鎌田正威最先開口即問他「你會英文嗎？」，其次則是說道「那麼法律呢？」。參見：氏著，〈鎌田先生に私淑の動機〉，《鎌田正威先生追想》，頁39～40。

總督府法院書記兼府屬小林里平於 1920 年 6 月以兼任翻譯官的方式昇為高等官七等，然後，旋即免去兼官，而得以疾病辭官，時年 55 歲；同時，成為外事課勤務，因為課長鎌田正威認為小林長年從事台灣的舊慣、法制及中國的法制調查，並且通曉中文與台語。他的著作頗多，當中，包括調查課的報告書第 41、第 42 及第 54 輯，可說是基於法學的素養，再結合中文的能力而成。茲整理小林的學經歷與相關著作如下。

表 2-3-1 小林里平的學經歷一覽

	時間	說明
來台前	小學畢業	曾以五年的時間在漢學塾修習漢籍
	1888.7	私立東京法學校畢業
	1889.7	文部省特別認可私立和佛法律學校畢業（即法政大學）；9 月進入日本新聞社
	1892	出版《商法明解》（白井商社發行）
	1894.3	出版《議會法規》（日本新聞社發行）
	1895.3	擔任第四回國內勸業博覽會事務局書記（月薪 30 圓）；1896 年 1 月獲該局獎賞 35 圓，3 月再獲頒一等銀牌
	1896.3	再度進入日本新聞社
	1897.5	擔任巴黎萬國博覽會事務局書記（月薪 25 圓）、擔任大日本帝國美術史編纂係囑託（月薪 25 圓）
	1898.10	三度進入日本新聞社；隔月出版《民法評釋》（本人發行）
來台後	1900.12	擔任覆審法院囑託（月薪 40 圓）；同月成為《台灣慣習記事》編輯主任
	1901.7	擔任舊慣調查事務囑託（月薪 50 圓）
	1902.7	以三年的時間向舊慣調查會囑託李少承 <sup>130</sup> 研究官話首度調查華南各地
	1904	以三年的時間向覆審法院通譯蕭呈輝研究台灣話文
	1905.1	開始在《台灣慣習記事》發表十五回的〈台灣（時文）字彙〉
	1905.6	受台北地方法院委託為中國時文講師
	1905.9	由日本物產會社出版《支那時文契字訓解》

<sup>130</sup> 李氏後來於 1906 年 3 月過世，他熟悉清朝的律令，小林可能從他學習不少有關的知識。參見：彙報，〈李少承君を悼む〉，《臺灣慣習記事》第 6 卷 4 號（1906.4），頁 84~85。



1907	由台法月報發行所出版《台灣年月誌》 二度調查華南各地
1908	被台北地方法院任為「土語通譯兼掌」
1910	由東京政教社出版《台灣歲時記》
1911	由殖產局出版《台灣案內》
1918	被台灣軍參謀部委託中國時文翻譯事務
1919.2	受台北地方法院委託為普通文官考生擔任漢文講師
1919.5	成為官房調查課兼務府屬，負責華南的法制經濟調查事務
1919.2	在《語苑》發表十回的〈中華民國新語ノ試ミ〉
1920.3	由官房調查課出版《中華民國司法制度》 由總督府出版《中華民國民律草案第三編乃至第五編》

資料來源：(1) 第 691 冊《明治三十四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56 號〈小林里平臨時臺灣舊慣調查事務ヲ囑託ス〉；(2) 第 3090 冊《大正九年高等官進退原議》，第 45 號〈兼任府翻譯官：小林里平〉。

由上表可見，小林里平畢業於法律學校，並且曾在法院任職，長期對於中國的語文有所研究，是他得以進行翻譯法律相關書籍的重要條件。此外，小林個人原本即關心清季以降中國的法律近代化事業，以及日本對中國的影響。<sup>131</sup>因此，調查課委託小林進行此項任務，可以說相當合適。

#### (四) 板倉貞男

1908 年 3 月板倉貞男自東京外國語學校法語學科本科畢業，同年 11 月任職海軍編修書記，1918 年 11 月至 1920 年 7 月在巴黎大學旁聽有關法國文學的課程，1922 年 3 月被任命為海軍大學的法語兼任教授，1924 年 3 月辭官以後從事著述，1925 年 4 月出版了《例解和文佛譯法》一書；除了法語的素養之外，由於他服務海軍期間，也曾進行

<sup>131</sup> 小林里平，〈中華民國今日の法律を見るまで〉，《台法月報》第 13 卷 3 號（1919.3），頁 167~174。

法國殖民地的調查，1925 年 10 月調查課於是加以採用。<sup>132</sup>

根據杜聰明的記載，他從日本留學回到台灣後（按為 1921 年底），當時除了第一高女教員龜山氏之外，無人懂法語可以教法文；其後，他拜託台北高商的新里榮造教授給予特別教學。<sup>133</sup>因此，在缺乏法語專家的台北，板倉的來到便顯得格外重要。1925 至 1928 年間，板倉曾在南洋協會台灣支部舉辦的法語講習會上授課。<sup>134</sup>講習生之一包括著名的台灣研究者武內貞義，可見其法語教學吸引不少有志者前來參加。<sup>135</sup>

除了法語的教學之外，板倉不時在報上與《台灣時報》撰文介紹法國與其殖民地的情況，有助於時人了解其政治的內涵。<sup>136</sup>板倉較為人所熟悉的著作是翻譯有關法軍攻台的《法軍遠征台灣史》，作者是法國步兵第 31 聯隊的陸軍大尉 **Garnot**，原書於 1894 年在巴黎出版，為免散逸，故而印刷了一百本存世。<sup>137</sup>平山勳即曾在自己的書中引用板倉的「名譯」，用以顯示法國人的觀點。<sup>138</sup>

不過，翻譯並非純粹使不同國度的文字讓人明瞭而已，譯者除了信實的原則之外，有時不免涉入本身的立場，或事後作出個人對文本

---

<sup>132</sup> 第 4011 冊《大正十四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65 號〈南支那及南洋ニ於ケル制度及經濟ニ關スル調査事務ヲ囑託ス：板倉貞男〉。

<sup>133</sup> 杜聰明，《回憶錄（上）》（台北：龍文，1989.6），頁 96~97。

<sup>134</sup> 橫井香織，〈南洋協會台灣支部と台灣總督府〉，《東洋史訪》（兵庫：兵庫教育大學東洋史研究會，2004.3）10，頁 54。

<sup>135</sup> 1928 年 7 月，台北高商校長武田英一在推薦武內貞義成為兼任教授的文件中，提及武內雖然只有高知縣立師範學校畢業的學歷（1903 年），但卻具備實力足以講授商品學、台灣事情及民族學；尤其，1910 年擔任國語學校副教授以來，武內隨高等法院通譯川合真永學習台灣話，隨森丑之助學習原住民語言，1919 至 1920 年在南洋協會主辦的講習會上接受越智有之馬來語教學，另於 1925 和 1928 年接受板倉貞男和新里榮造的法語教導，至於荷蘭語則是透過自修培養閱讀的能力。參見：第 10053 冊《昭和三年七、八、九月高等官進退原議》，第 56 號〈兼任台北高商教授：武內貞義〉。

<sup>136</sup> 茲舉三例說明之：（1）《臺灣日日新報》，1926.10，〈佛蘭西の政黨と内閣〉（上）、（下）。（2）板倉貞男，〈佛領印度支那法制調査〉（一）~（十），《臺灣時報》第 78~87 號（1926.5~1927.2）。（3）板倉貞男，〈フランス共和国の中央國政機關〉，《臺灣時報》第 133 號（1930.12）。

<sup>137</sup> 板倉貞男（譯），〈本書出版の由來〉，《佛軍台灣遠征史》（台北：台灣時報發行所，1932.2），未標頁碼。

<sup>138</sup> 平山勳，《台灣社會經濟史全集（4）》（台北：台灣經濟史學會，1935.8），頁 46。

的詮釋，板倉就是一顯著的例子。出身軍旅的他，對於滿洲層出不窮的日本權益受侵事件，略謂：令人想起四十七年前法軍攻台的史實，條約違反、襲擊、虐殺等當時法國所嘗到的辛苦經驗，日本也正在滿洲面臨著，今昔竟不可思議地相似；於是板倉以史為證進行論述，他雖然未明白寫出，但似乎隱含「誘發更為長期、更加艱鉅的新戰爭」之意。<sup>139</sup>

#### （五）原口竹次郎

原口竹次郎本身外語相當流利，能閱讀英文、德文及荷蘭文<sup>140</sup>，就連外事課的專家也會向他請教英文。<sup>141</sup>此外，原口相當重視語言的教育。1924年初，原口曾經批評南洋協會台灣支部反轉應注重的語言之順位，認為不該忽視更為實用的英文和荷蘭文，但該部卻特別舉辦馬來語的講習會，同時，主張東京外國語學校應調整其馬來語學科的組織。<sup>142</sup>當時，台北高商從1924年起開始重視荷蘭語<sup>143</sup>；由此可知，原口的意見並非個人獨發，事實上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原口也致力培養年輕的調查課員，例如鹽谷巖三於1930年被總督府派往巴達維亞的法科大學就讀，原口接受訪問時強調，將來如果仍有優秀的青年，也將仿照巖谷的先例使其出國深造。<sup>144</sup>

1929年底，澤田其枝夫在《台灣建築會誌》上翻譯有關南洋木材的文章，他之所以嘗試譯成日文，契機來自於向原口竹次郎借閱英國

---

<sup>139</sup> 板倉貞男，〈滿洲事件と佛軍台灣征討役の回顧〉，《台灣時報》（19.），頁171~173。在二次大戰末期，竹村猛亦曾翻譯本書，似乎與戰時的氣氛也有關聯。參見：《民俗台灣》第4卷2號（台北：東都書籍台北支店，1944.2），頁37。

<sup>140</sup> 田中一二，《台灣の新人舊人》，頁517~518。

<sup>141</sup> 同上，頁147。

<sup>142</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4.1.1，〈台灣を踏石とする南支南洋への飛躍〉。

<sup>143</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5.7.26，〈南洋飛躍には和蘭語を學ぶが肝腎〉。本則報導是該校的六名學生在淺香教授的率領之下，1925年6月前往南洋各地訪習，在7月下巡迴台之後所談的心得。

<sup>144</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0.1.17，〈督府調査課員がジャバに留學〉、〈南洋發展策の一つの現れ〉。

北婆羅洲山林局發行的書籍。<sup>145</sup>可見原口間接推廣有關南洋的知識。其後，該文由台北高商畢業的三島文平接著翻譯，實則，三島還為該刊譯了數篇外文。<sup>146</sup>三島後來在 1937 年 7 月辭職，而預定轉往福州《閩報》館工作<sup>147</sup>，結束了從 1930 年 11 月號以來長達六年又八個月的《台灣時報》編輯生活，繼任者為中村真雄。<sup>148</sup>

在相關書籍的編輯方面，也可以發現原口的用心。例如賀來佐賀太郎擔任民政長官時，原口竹次郎奉命將《被忽視的台灣》( )一書譯成英文，於是調查課的蘭巴哈費時數個月加以完成。<sup>149</sup>又如荷蘭人史塔特 (Stadt) 曾於 1920 年來台灣，看見總督府的官吏閱讀荷蘭東印度的報紙，但因為沒有字典，加以人才不足，而覺得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sup>150</sup>Stadt 曾在東京帝大鑽研日語，1921 年擔任巴達維亞的日本人事務局長，直到 1933 年因經費縮減，該局始被裁撤。1922 年，史塔特即著有一本荷日辭典，1934 年又出版 1 本日荷辭典；在推出日荷辭典的過程當中，史塔特曾與副領事小谷淡雲討論該書的印製，小谷進而與原口竹次郎交涉，終於由南洋協會加以發行，總督府並且補助 4000 圓，校正的工作則是由官房調查課的山岸祐一負責，山岸曾以外務省留學生的身份長期待在荷蘭。<sup>151</sup>

---

<sup>145</sup> 澤田其枝夫，〈英領北ボルネオ材に就て〉，《台灣建築會誌》第 1 輯 5 號(：，1929.11)，頁 8。

<sup>146</sup> 詳見：《台灣建築會誌》。

<sup>147</sup> 第 10254 冊《昭和十二年七、八、九月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第 7 號〈依願免本官：三島文平〉。

<sup>148</sup> 參見：《台灣時報》(1937.8)，頁 192。

<sup>149</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7.6.15，〈台灣に關する珍書〉。

<sup>150</sup> 《外務省記錄》，〈蘭領東印度日本人局長「ファンデスタット」氏口演「演題、日本人及和蘭人」〉。(資料來自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史塔特在演講當中提及日本國內比過去更重視荷蘭與其殖民地，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荷蘭的報導值得相信，日本政府遂越發體會荷蘭研究的必要性；此外，他也回顧荷蘭語在日本輸入西方文明的過程中扮演的媒介角色，而他本人所認識的醫界元老石黑忠惠，年輕時即學習荷蘭文，並曾出示親筆寫的荷日醫學辭典給看。

<sup>151</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4.10.10，〈蘭人スタット氏が苦心の著・日蘭辭典〉。值得一提的是，小谷淡雲與調查課的關係匪淺。1925 年 12 月，調查課即委託小谷進行南洋調查，並給予津貼一千圓；小谷時為爪哇南洋協支部的囑託，由於任職大谷光瑞經營的咖啡園，1921 年 9 月得到大谷的同意而加入該會支部。參見：第 4012 冊《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62 號〈南洋制度經濟調查事

#### （六）吉村周二郎

調查課的人員對於相關的機構往往提供資料上的協助，例如 1933 年台北高商的圖書館編輯菲律賓研究文獻目錄，調查課即加以援助。<sup>152</sup>此外，學者如果需要研究素材時，也能獲得該課的幫忙，茲以吉村周二郎與台北帝大的力丸慈圓為例稍作說明。

吉村周二郎於 1919 年 3 月進入調查課任職，1925 年通過普通考試，1926 年 8 月曾被派往內閣統計局參加講習會，1929 年 6 月成爲府屬，同時尚有另外二人，分別是戶田龍雄（台北高商 1924 年）與永嶺一虎（台北高商 1925 年畢業生）。<sup>153</sup>

力丸慈圓於 1933 年《台北帝國大學記念講演集》中有一篇論文，名爲〈臺灣氣候與工作效率的關係及日台灣人之間的比較〉。<sup>154</sup>由力丸在文末的「附記」可知，在撰寫過程得到幾人的幫助，其中之一即是當時任職調查課的吉村周二郎，此外，尚有專賣局煙草課的坂上福一及台北測候所所長西村傳三。

本篇論文討論氣候對工作效率的影響程度，同時，也比較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差別，相當具有創意。首先，力丸指出西方的研究證實氣溫、濕度及氣流等對人的身心作用甚大，在日本的倉敷和京都等地也已作過類似「舒適地帶」的實驗。於是，他對照台灣人女工的煙草包裝作業，及日本人女子的國勢調查票穿孔作業，以平均每人每小時的工作量爲每日的平均效率（前者爲 398 天乘以 84 人，後者爲 210 天乘以 25 人），並以台北測候所的觀測表代替工作空間的溫濕度（從開工前 1、2 小時至收工爲止），而後者的基準較少是因爲必須扣除最

---

務囑託：小谷淡雲〉。

<sup>152</sup> 《南邦經濟》第 1 卷 1 號（台北：台北高等商業學校研究室），頁 37。

<sup>153</sup> 第 10221 冊《昭和四年四、五、六月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第 134 號〈任總督府屬：吉村周二郎〉。

<sup>154</sup> 力丸慈圓，〈臺灣に於ける氣候と作業能率との關係並にその内台灣人比較〉，《臺灣文化論叢》（台北：清水書店，1945.2），頁 265～312。臺灣產業奉公會在 1945 年將本文其連同其他文章予以少量再刊；而關於力丸的學經歷，可以參見同書的作者介紹。另外，1933 年 10 月號的《台灣時報》也刊載其論文〈氣溫と作業能率〉。

初 6 週的練習期、停工及休假，以及冬天有暖房設備的緣故。研究結果顯示，就氣溫來說，台灣人工作以攝氏 23.5 度為佳，日本人為 19.5 度；台灣人工作效率優良的前二個月為 11 月和 10 月，而最熱的 7、8 月及最冷的二月則是效率最低的時候，至於日本人女就業員的穿孔作業，依然以 11 月的效率最高，而 7 月則是最差的一個月；台灣人在高溫或低溫之下工作皆會降低效率，日本人則溫度一高其工作效率比起台灣人顯著下降，亦即台灣人頗能耐熱，兩者約 1 比 1.7。在台日本人的適宜溫度比台灣人低約 3、4 度，反而趨近溫帶地區的人民，不過，他們大多數在台出生，然則何以造成此種落差，力丸認為或許是移民加上世代因素的關係。

此外，力丸也曾提到台北菸草工廠的女工，在 10、11 月比起 7、8 月，每人平均一小時相差了 4 分鐘的效率；因此在多數人的場合裡，必須考慮台、日本人的不同，並改進冷氣設備。<sup>155</sup>要之，由於來自各方面的專業協助，加以對國外大氣研究動向的掌握，力丸慈圓遂得以順利進行人體機能的探討。

## 二、調查課裡的台灣人

台灣人要在殖民官僚體系中任職，教育訓練和任用資格是最起碼的條件。<sup>156</sup>日語的能力固不待論，受過近代的高等教育，也是台灣人得以擠身官房的重要憑藉。在總督府官房任職的台灣人當中，以蔡伯毅最富傳奇性。<sup>157</sup>蔡氏原名蔡國珍，1921 年 2 月改為伯毅；他於 1917

---

<sup>155</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4.8.25，〈暑さと能率〉。力丸慈圓的研究論文主要發表於《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哲學科研究年報》與《心理學研究》。此外，報上也曾介紹他的相關研究結果，例如在味覺的研究方面，力丸於 1932 年 9 月從美國的《科學》雜誌得知一名化學家進行有關白人、印地安人及兩者的混血兒之味覺實驗，1933 年 3 月獲得材料（粉末藥品）之後，藉由來到台北的「歸順蕃」與小學校學生的家庭加以實驗，針對種族、性別及遺傳，證實在人種之間存在差異的結果，並且更透過第三高女進行台灣人方面的研究；同時，他反駁美國學者認為此與唾液有關的說法。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3.7.27，〈色盲以外に味盲が發見さる〉。

<sup>156</sup>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1995.4），頁 199。

<sup>157</sup> 杜聰明於 1921 年 10 月任醫專副教授兼中研技師，敘高等官七等而回台就

年 7 月自早稻田大學專門部政治經濟學科畢業後，歷任上海復旦大學教授（1917.10）、廣東軍政府非常國會秘書（1918.1）、靖國軍第三軍總司令部參議官（1918.4）、台灣總督府警部（1919.10）、外務省囑託（1920.3）等職，1921 年 8 月成爲總督府屬。<sup>158</sup>蔡氏後來辭去官職，儘管當局再三慰留，仍在 1924 年 3 月搭乘盛京丸前往上海。<sup>159</sup>幾年之後，林進發與劉克明都提到他在中國的杭州爲人看相。<sup>160</sup>

根據 1919 至 1938 年度的《台灣總督府職員錄》，此一期間先後在調查課任職的台灣人計有 23 位，平均每一年度有 5.2 人在職。其中，較具特色者爲：（1）周阿斌是唯一全勤的人，他自 1936 至 1938 年度擔任囑託；（2）超過十年以上者，排名第二爲王淇水，第三名則是李福生；（3）其它具有雇員以外的身分者，例如曾六瑞於 1922 與 1923 年度曾是府屬，李讚生自 1924 至 1926 年間擔任府屬，蔡愛仁於 1928 年度爲囑託，林開煥自 1935 至 1938 年度爲府屬，而林德榮、林平城及黃寶樹三人於 1938 年度則擔任囑託。

表 2-3-2 任職調查課的台灣人概覽

姓名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小計
1 周阿斌																					20
2 曾六瑞																					8
3 林聯順																					1
4 吳明旺																					6
5 楊阿泉																					4

職時，台灣人只有林茂生（台南高商教授）與蔡伯毅（翻譯官）二位被任命爲高等官。參見：氏著，《回憶錄（上）》，頁 83。

<sup>158</sup> 《大正十年公文雜纂第三十卷》，〈蔡伯毅ヲ屬ニ任用シ〉。（資料來自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sup>159</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4.3.15，〈蔡伯毅氏渡支〉。

<sup>160</sup> 林進發寫道：前台灣總督府翻譯官蔡伯毅，由於有各種生活的經驗，通達事理，善能推知人們的心思。參見：氏著，《台灣人物評》（台北：赤陽社，1929.8），頁 10。另外，劉克明寫道：在台灣人之中，台中出身的蔡伯毅由於得到湯地幸平的賞識而成爲第一位警部與翻譯官，他後來脫離國籍並前往中國的杭州，改以觀相爲業。參見：氏著，《台灣今古談》（台北：新高堂，1930.11），頁 139。又根據 1952 年 10 月 9 日的《聯合報》，記載蔡氏「久居故國，並恢復福建泉州原籍，直至本省光復後始自滬歸台，在台中執行律師職務」。（資料來自：聯合知識庫 <http://udndata.com/>）





李氏仍然任職於政府部門，歷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專門委員、嘉南大圳理事組合長、台南縣立文化出版社董事、台南縣政府建設局局長等職。<sup>162</sup>

此外，1932年曾在《台灣時報》撰文介紹新竹蓮草的產額、製造過程及其用途。<sup>163</sup>不久，該文轉載日本國內的雜誌，可見受到相當的矚目。<sup>164</sup>

林開煥為苗栗公館人，1928年自台北高等農林學校林學科畢業，1932年復自台北帝大理農學部農學科畢業，接著即任職於國勢調查部；調查課由於從事資源調查，而需要三名員額，在中島喜市辭職後，林氏與三島文平（台北高商1928年畢業生），以及石橋忠（台北高商1930年畢業生）遂同時在1934年9月成為府屬，林氏的月薪為75圓。<sup>165</sup>林開煥就讀高等農林時，接受林政學老師深谷留三的指導。<sup>166</sup>林氏的台北帝大畢業論文題目是《日本甘蔗糖價的統計研究》。<sup>167</sup>其論文顯示自學生時代即熟悉統計學的利用方法。戰後，林氏出版《生命統計學》<sup>168</sup>一書，徐慶鐘為其作序，寫道：自日據時期迄今，台灣居民生命表之編製，先後四次，林君始終參予其事。此外，林氏對台灣的農業普查亦貢獻甚多。<sup>169</sup>可見，林氏在戰前所累積的工作經驗，對於其

---

(5) 林進發，《台灣官紳年鑑》（台北：民眾公論社，1933.），頁598；(6) 太田肥洲，《新台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産業史》（台北：臺灣評論社，1940.1），頁278；(7) 《台灣人士鑑》（台北：興南新聞社，1943.3），頁437。

<sup>162</sup> 章子惠，《台灣時人誌》，（台北：國光出版社，1947.3），頁38。

<sup>163</sup> 李讚生，〈新竹州一蓮草〉，《台灣時報》第151號（1932.6），頁117~119。

<sup>164</sup> 李讚生，〈新竹州の蓮草〉，《紙業雜誌》第27卷5號（東京：日本製紙聯合會，1932.7），頁17~18。

<sup>165</sup> 第10242冊《昭和九年七、八、九月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第90號〈任屬、調查：林開煥外二名〉。

<sup>166</sup> 成松俊男，〈先生斷想〉，《榕畔》（東京：榕畔會校史編集委員會，1978），頁128。

<sup>167</sup> 本書藏於台灣大學圖書館。

<sup>168</sup> 林開煥，《生命統計學》（台北：中華書局，1975.3）。徐慶鐘的略傳可參閱：《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6輯（台北：該館，1998.2），頁208~210。

<sup>169</sup> ，《中國統計學社創立六十週年紀念集》（台北：中國統計學社，1990.5），

日後從事公職有相當的幫助，也造就他個人在此一方面的突出表現。

在台北帝大同學的心目中，林開煥的才華頗受肯定，是一位頭腦清楚的好青年。<sup>170</sup>

最後，再舉一例說明任職於官房的台灣人的能力。田大熊在外事部任職時，曾回憶自己從 1916 年 5 月開始學習日語，1922 年 3 月時贏得畢業證書第一號，接著陸續升上中學校、高等學校及大學。<sup>171</sup>田氏同樣具有極佳的學歷，為 1933 年台北帝大文學科東洋文學專攻的畢業生，其論文為《唐宋以前的評論界》。<sup>172</sup>此外，田氏也愛好研究台灣的歷史與文化，曾經探究鄭成功登台的日期<sup>173</sup>，以及在《民俗台灣》撰文介紹招贅婚<sup>174</sup>、安胎符<sup>175</sup>及春聯。<sup>176</sup>

---

頁 605。

<sup>170</sup> 高瀨文之，〈學友の面影〉，《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創立六十年記念誌》（該誌編集委員會，1988.10），頁 68。

<sup>171</sup> 田大熊，〈我が國語習得の思ひ出〉，《國語の台灣》第 2 號（臺北：國語の台灣社，1941.12），頁 33~37。

<sup>172</sup> 本書藏於台灣大學圖書館。至於其生平簡介可參閱：張寶三，〈任教台北帝國大學時期的神田喜一郎之研究〉，《日本漢學研究初探》（臺北：財團法人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2.3），頁 345~346。

<sup>173</sup> 石萬壽（譯註），〈國姓爺的登陸台灣〉，《台北文獻》第 44 期（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78.6），頁 111~121。本文原刊於 1938 年 12 月的《台灣地方行政》。

<sup>174</sup> 田大熊，〈本島人婿入婚姻の風習〉，《民俗台灣》第 1 卷 2 號（台北：東都書籍台北支店，1941.8），頁 6~7。本文從男、女二方的家庭因素說明之所以決定招贅的情形，以及進行的方式。

<sup>175</sup> 田大熊，〈安胎符〉，《民俗台灣》第 1 卷 5 號（1941.11），頁 34~35。本文介紹產婦懷孕時的禁忌與胎教，以及安胎符與押煞符的作法。

<sup>176</sup> 田大熊，〈春聯〉，《民俗台灣》第 2 卷 1 號（1942.1），頁 18~20。本文描述春聯的起源與演變、所用的顏色，以及不同空間的適當用語。